

浙江大学人文学院

---

硕士学位论文

---

传教医生雒魏林在华活动研究

---

姓名：韩清波

---

申请学位级别：硕士

---

专业：中国古代史

---

指导教师：龚缨晏

---

20080601

## 摘要

雒魏林（1811-1896）是鸦片战争前较早到达中国的传教医生，1838年奉伦敦传教会之命前来中国。在华期间，他主要在澳门、上海等地活动，时间长达20年。一开始在澳门、广州传教施医，从事医务传教活动。鸦片战争期间，在舟山开设医院。1844年，在上海创立第一家西医医院，1857年底回国。1861年以英使馆医师名义再度来华，在北京活动了三年。

医务传教是近代来华基督教传教士进行宗教传播的重要方式，传教医生是当时来华传教士中的重要群体。论文的主要内容是通过雒魏林在华活动的论述，对于近代基督教在华医务传教活动进行评价。论文主要分为三部分。首先对近代基督教在华医务传教活动形成的背景和初步开展情况进行了介绍，接着介绍了雒魏林在华的医务传教活动及一些政治活动，又分析了他对当时中医和中国社会的认识。在华活动的二十多年中，雒魏林在从事医务传教的同时，对中国社会进行了深入观察。他在早期来华传教医生中占有重要地位。

关键词：医务传教，雒魏林，传教医生

### Abstract

William Lockhart (1811-1896) , a British medical missionary who came to China before the Opium War, was appointed a medical missionary by the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in 1838. He had been engaged in medical mission for twenty years in China. In the Opium War, he set up a hospital in Chusan. In 1844, he also established a hospital in Shanghai. He left Shanghai and returned to England by the end of 1857. In 1861; he returned to China again and took activities for three years in Peking.

Medical mission is an important way to carry on the religious dissemination by the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in China. The medical missionary is an important community of missionaries coming to China. The primary coverage is to show modern protestant' s medical mission in China through William Lockhart' s missionary work in China. The article is mainly divided into three parts. First, it introduced the background and the preliminary development of the missionary work in China. Second, it introduced Lockhart' s missionary work in China and political activities. Finally, it introduced Lockhart' s attitude on the Chinese medicine and Chinese society. Taking in the medical mission in the meantime, he also observed Chinese society. He enjoyed considerable fame among the early medical missionaries.

Key words: medical mission, William Lockhart, medical missionary

## 绪论

有关中国近代基督教的研究,近年来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关注。基督教传教士在传教过程中,同时伴随着教育、出版、卫生等事业。医务传教就是基督教新教传教的重要途径。鸦片战争前的基督教的医疗活动都是属于私人性质的,不敢公开开展。到了1835年由美国公理会传教士伯驾主持创办了广州眼科医院,可以说是基督教在华医务传教事业的开端。在鸦片战争前,医务传教活动仅限于广州和澳门两地,南京条约签订后,开始扩展到香港和其他通商口岸。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医务传教活动开始向中国内地扩展。19世纪后半期,医学和传教相结合的关系逐渐淡化。一些专职医生陆续来到中国,参与了西医传播的行列,医务传教中的宗教色彩也就渐次淡化。1886年“中华博医会”的成立,标志着基督教在华医务传教工作的终结。此后,传教医生不再担任传教工作,而致力于西医学在华的介绍和传播。

由于基督教医务传教活动在中国的基督教史和医学史上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因此,自其出现之后就收到了学术界的重视。大体上说来,学术界对基督教医务传教的研究过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19世纪30年代到19世纪末)研究者主要为传教士和教会史专家,大多为史事性的记述。

19世纪30~50年代,传教士所办的《中国丛报》(*Chinese Repository*)就刊发了一些医院报告和涉及早期教会医疗事业的文章。1861年传教医生雒魏林出版了《在华行医传教二十年》(*William Lockhart, The Medical Missionary in China: a Narrative of Twenty Years' Experience*, London: 1861.)一书,对基督教早期医务传教做了全面、细致的叙述。1867年,英国传教士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著有《来华新教传教士纪念集》(*Memorials of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to the Chinese*),对当时来华传教士都作了小传,提供了基本的珍贵材料。1868年和1887年《教务杂志》、《中华博医会报》先后创刊,它们都刊发有传教士撰写的关于教会医疗事业历史发展的文章。一些传教医生的传记也先后问世,如《马根济:来华的传教医生》(*John Kenneth Mackenzie: Medical Missionary to China*, London: 1891.)、《伯驾生平、书信和日记》(*the Life, Letters, and Journals of Rev. and Hon. Peter Parter*, Boston: 1896.)等。中、英文的教会史和医学传教史的著作也相继出版。这些著作多为史事性的记叙,而非专门的学术研究性质。不过,它们展现了教会医疗在不同时空范围的发展历史,具有相当重要的史料价值。

第二个阶段(20世纪初到20世纪60年代)主要集中在传教界和医学界,史学界研究较少,有很强的时代性。

20世纪上半叶,教会医疗事业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传教界和医学界。教会史著作中有季理斐的《基督教差会在华百年史》(*A Century of Protestant Missions in China*, Shanghai: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907.),该书对1807年~1907年间来华的基督教差会的历史做了较为具体的介绍,同时对各差会的医疗事业做了相应的介绍。美国赖特烈的《基督教在华传教史》(*A 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 in China*, London: Society for Promoting Christian Knowledge, 1929.),对基督教在华传教史做了全面深入的研究,并分不同时期对1927年前基督教、天主教在华医疗事业做了论述。专门的医学传教史著作主要有:《医学传教在中国》(*Medical Missions in China: in Connexion with the Wesleyan Methodist Church*, London: 1909.)、《伯驾与中国的开放》

(Peter Parker and the Opening of Chin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等。有关教会医院历史的著作有:关于广州博济医院的《博济医院百年史》(*One Hundred Years of the Canton Hospital 1835 -1935*, Shanghai :1935.)、关于上海仁济医院的《仁济医院95年史》(*Ninety - five Years : A Shanghai Hospital, 1844- 1938.*) 等。著名的传教医生的传记有:《满洲的司督阁——先锋和传教医生》(*Dugald Christie' s Wife ed., Dugald Christie of Manchuria : Pioneer and Medical Missionary*, London : James Clarke & Company ,Limited , 1932.)、《远东传教的先驱——麦嘉缔传》(*Robert E. Speer edite , A Missionary Pioneer in the Far East , A Memorial of Divie Bethune McCartee*, New York : 1922.)。30年代中国医学界重要的著作有:王吉民与伍连德所著英文版《中国医史》(*History of Chinese Medicine*, 1932),在叙述中国近代医学史时,充分利用了教会文献等史料比较完整地叙述了教会医疗事业的发展变迁。还有陈邦贤的《中国医学史》,该书对教会医院、教会医学教育的情况有所关注。不过,以上二书偏重于医学史,对教会史相关的问题以及教会医疗事业对中国的影响较少考虑。1940年王治心的《中国基督教史纲》一书提及了基督教传教士与中国医药发展的关系。20世纪50、60年代,受时代的影响,真正的研究成果并不多。史学界也在研究教会医疗事业,但大多将其看作是帝国主义进行文化侵略的工具。如:刘大年的《美国侵华史》(人民出版社,1951年第1版,1954年第2版)在论述近代美国对华进行文化侵略时,将教会学校、教会医院、麻风病院等传教事业均看作是文化侵略的重要表现;卿汝楫的《美国侵华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2年)将教会医疗事业作为美国侵华活动的一个方面做了论述;李时岳的《中国近代反洋教运动》将教会医院视为帝国主义进行文化侵略的工具,认为它是传教的一种诱饵。

第三个阶段(20世纪80年代以来)受到历史学、宗教学、医学等学术界的重视,在个案、区域、宏观上进行了多方位的研究,并出现了一批新成果。

从80年代初开始,其他领域的学者也开始着手研究这一领域。先后出版了顾长声的《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近代来华新教传教士列传》两部著作。关于传教医生,梁碧莹从中西文化交流的角度对嘉约翰、伯驾等传教医生做过研究。另外,在史料整理方面《反洋教书文揭帖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清末教案》等有关近代中国基督教史的文献相继问世。薛愚的《中国药学史料》对有关传教医生的医药传播史料给予了重视。上述研究和史料在不同程度上都涉及教会医疗事业。一些文化史著作对教会医疗事业在文化传播中的作用做了研究。<sup>2</sup>在医学史方面,何裕民主编的《差异、困惑与选择——中西医学比较研究》(沈阳出版社,1990年),把中西医学置于东西方文化宽广的历史和现实的背景中,研讨并回答了医学领域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反思了近百年直至今日的中西医交汇之艰难历程及由此激起的众多思潮之深层根源。马伯英等人的《中外医学文化交流史》(上海文汇出版社,1993年)一书,以医学的跨文化传通为题,论述了近代医史中跨文化传通的轨迹、西方医学的传人及中西医论争的影响。马伯英的《中国医学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虽然重在阐释中医文化的本质和前途,但也有益于人们对近代中西医文化交流的理解和把握。甄志亚、

<sup>1</sup>比较重要的文章有医学史界王吉民的《伯驾利用医药侵华史实》(《医史杂志》第3卷第3期)、顾杏元的《基督教会医院与帝国主义侵略》(《人民保健》1960年,第1号)。两者虽然资料比较丰富,但有很强的时代印痕和片面性。

<sup>2</sup>如龚书铎主编的《中国近代文化史》、史全生主编的《中华民国文化史》、熊月之的《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等文化史著作对晚清和民国时期的教会医疗事业均有论述。

傅维康主编的《中国医学史》(人民卫生出版社, 1991年)对近百年的中国医药学详加叙述,成为进一步研究近代中国医学史的史料依据。赵洪钧的《近代中西医论争史》(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 1989年)从中西医论争的历史背景、清末医学界的变迁,到辛亥革命后中西医论争和论争中的各种问题做了系统全面的论述,对重大医学事件及人物都有分析评价。在港台地区,李志刚的《基督教早期在华传教史》(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5年)一书专辟“基督教士之医药传教事业及其影响”一章,对鸦片战争前后的教会医疗事业做了实证研究。此外,汤清所著的《中国基督教百年史》(香港道声出版社, 1987年)论述了基督教“开创时期”和“广传时期”的医药事业,而且该书在论述各差会的传教史时对其医药事业有所涉及。在杨森富的《中国基督教史》(台湾商务印书馆, 1968年)、邵玉铭编的《二十世纪中国基督教问题》(正中书局, 1980年)等著作中,也涉及到了教会医疗事业。在个案研究上,王尔敏对上海仁济医院做了实证的研究。上述研究对教会医疗事业及其在文化传播、社会现代化中的作用做了充分的肯定,但对整个教会医疗事业及其影响还缺乏全面的研究。

虽然学术界对基督教教会医疗事业的研究已取得了一些成果,但对传教医生的个案研究较少,对早期来华的传教医生的研究更是不足。之所以选择雒魏林(William Lockhart)作为研究对象,是因为他是最早来华的基督教传教医生之一,是早期传教医生中极具代表性的人物。他长期在上海、北京等地进行医务传教活动,比伯驾等人活动范围更广,对中国社会文化也有比较深刻的认识。通过对他的考察,可以从侧面看到当时基督教在华传播状况及当时中国社会状况的变化,同时对基督教在华医疗卫生事业有更深刻的认识。可以说,对他的个案研究具有一定的典型性。雒魏林本人的英文著作有《在华行医传教二十年》(*The Medical Missionary in China: a Narrative of Twenty Years' Experience*, London: 1861.),在著作中他详细描述了自己在中国的医务传教活动及当时的教会医疗卫生事业概况,是研究他本人的直接材料。同时,还有大量的基督教教会文献,包括各差会的教务报告、会议记录、传教史志、传教士的自传和日记等。另外,中文文献对于雒魏林也有零星的记载,但相对较少。可以说相关的资料比较丰富,却比较分散,且存在许多不实的叙述。如雒魏林在其著作《在华行医传教二十年》中对青浦教案中自己的罪行没有任何涉及,而对于外国势力的不法活动却有很多美化。在广泛搜集外文资料的同时,还要尽力查找这一方面的中文史料。在此基础上加以分析和考证,才能理清雒魏林在华活动的脉络,并得出对其活动的正确评价,从而对当时的基督教教会医疗事业有正确的认识。

就目前的研究而言,尽管许多外文著作和教会文献中都涉及到雒魏林的活动,不过至今依然没有专门的研究。顾长声的《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近代来华新教传教士列传》对他有专门的介绍,但主要是介绍其在中国的部分活动,缺乏深入的分析。香港 G. H. Choa 所著的《新教传教医生在中国》(*Protestant Medical Missionaries in China*, The China University Press, 1990.)以伯驾、雒魏林等人作为主要个案,论述了传教医生在传教、行医中的作用,也仅仅对雒魏林在华医务传教活动进行简单的介绍。本人在前人的基础上,力图对雒魏林在华活动作一全面的考察,并且以此为实例,对早期新教传教士的医务传道活动作一评价。

## 一、鸦片战争前基督教在华医务传教活动状况

### (一) 来华基督教人士的早期医务实践

在近代基督教医务传教活动展开之前,西方医学在中国的应用已经有了一些记载。早在唐代景教入华之时,已有藉医传教的记录。元代也里可温教士,也曾将西医西药传入,在京师设医院曰广惠施。<sup>1</sup>1569年,天主教传教士在澳门设立医院,为人治病。与西方医学密切相关的西洋药学也同时传入中国,《药露说》、《本草补》是西洋药理学最早传入中国的书籍。明末来华的利玛窦(Mattheus Ricci)、龙华民(Longobardi PN.)、邓玉函(Joannes Terrenz)、卜弥格(Boym M.)等都通医术,他们中又以邓玉函、卜弥格最为突出。邓玉函来华前曾在欧洲行医,来华后曾在澳门行医,并做病理解剖。卜弥格在医术上极有造诣,曾为波兰国王的首席御医。来华传教期间他著有《医钥》、《中国医家》等书,将中国医术向西方介绍。到清代,因康熙帝对西方科学技术的推崇,使传教士中的善医者开始为皇室服务。内地有些地方,甚至皇宫中都已经使用西药。康熙皇帝患疾心悸症、上唇生瘤,均由传教士用西医西药治愈。鲍仲义、樊继训、罗德先、罗怀中、安泰五人都是康熙时来华的传教士,都在太医院任职。他们除给皇帝、王公大臣看病外,还经常施舍医药给穷人。乾隆时来华的韩国英、索德超也是医生。<sup>2</sup>19世纪前由天主教传教士传入的西方医学虽然涉及了西医理论、临床、药物及制法等,但并没有完全反映出当时西方医学的一般水平。而且,当时的西医在对疾病认识和治疗上并不比中医高明,并没有使当时的中国人真正发生兴趣,对于中国医学发展的影响也很有限。即使已经传入中国的西方医学知识,也由于缺乏可以凭借的依托,很快淹没在中国传统的知识体系里。总体上,来华的天主教传教士中精通医学的比较少,与下层民众接触也少,并没有真正将传教和医学结合起来,还没有形成医务传教。

19世纪初,基督教新教传教士的来华揭开了西方医学在中国大规模传播的序幕。1807年,英国新教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 1782-1834)来到澳门,标志着近代基督教新教在华传教事业的开始。作为新教在中国传教的开山祖,马礼逊在翻译、出版、教育等各方面都做出了巨大贡献,在医务方面的开创之功也不容忽视。他在东印度公司做翻译的同时,还兼任在华西方人的汉语教师。其学生中有一个名叫皮尔逊(Alexander Pearson)的医生,与李文斯顿(John Livingstone)、郭雷枢(Thomas Richardson College)齐名,是当时西医东传方面的重要人物之一。皮尔逊于1805年写了一本《英吉利国新出种痘奇书》,首次向中国介绍了种痘免疫之法。后由斯当东代为译成中文,中国生徒海官又学习其法,西医种痘法于是流行于中国。<sup>3</sup>成功的传播种痘法“是近代东方历史上的大事件,其出版的小册子广为流传并相当有作用。”<sup>4</sup>从皮尔逊开始传播的牛痘接种方法,在西医最初未能形成影响时,成为来华传教医生行医的主要方式。随着日后教会在中国各地开办医院,种痘方法沿长江流域向内地传播,一直深入到西南少数民族地区。

鸦片战争前清王朝奉行闭关锁国政策,传教士在中国传教面临着一系列困难。正如传教士史蒂芬(Stephen)在《中国丛报》(*Chinese Repository*)上提出

<sup>1</sup>何小莲:《西医东渐与文化调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5页

<sup>2</sup>曹增友:《传教士与中国科学》,宗教文化出版社,1999年,第353-355页

<sup>3</sup>李志刚:《基督教早期在华传教史》,台湾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254页

<sup>4</sup>William Lockhart, *The Medical Missionary in China: A Narrative Twenty Years' Experience*, p.121

的在华宣教的难点：①束缚外国人的法律；②禁止外国宗教的法令；③中国的教育系统；④语言上的障碍。但他还提到了在华传教的一些有利条件：①可与中国人特别是穷人进行有限的交往，尤其是在港澳、广州等沿海地区；②知识读物的散发；③不存在占统治地位的阶层；④中国穷苦人的意向；⑤外国传教士在华传教的兴趣等等。<sup>1</sup>因此，他认为需要适当改变单纯宣讲教义的传教方式以适应中国的国情，而通过医务活动来传教则是一种最佳的方法。因为“医生的医务工作，不单表现在形式上，而且深入到患者的家中，医生治疗并安抚他们的心灵、诊治他们的身体，耐心倾听患者反复诉说的重重心事：因病痛带来的苦恼和忧郁，用同情的语言抚慰、鼓励患者。陌生人立即觉得医生是个朋友，是可以信任倾诉的，从而获得慰藉。”<sup>2</sup>

基督教差会派遣传教士来华，目的当然不是为了给中国人治疗疾病，而是“通过治病救人方式向中国人展示基督教真实的仁慈，并创造机会向那些求诊的病人传播基督教义。”<sup>3</sup>在传教的过程中，他们发现借助医务进行传教比直接传教更有效果，也是考虑到在华传教士的身体状况。因为当时许多来华的传教士因不能适应气候和生活条件的改变，健康状况普遍不佳，导致过早的死亡或回到国内。比如在美部会开展传教活动的最初二十多年时间里，该会有45名传教士死于国外，还有31人出于健康原因而提前回国。针对这种情况，美部会让其部分传教士接受医学训练，然后分别派往不同地区，为他们的同伴提供医疗服务。从1819-1834年间，美部会共派遣了7名精通医学的传教士到全国各地。<sup>4</sup>

在马礼逊来华期间，爱丁堡大学(University of Edinburgh)的副校长贝尔德曾请马礼逊代为调查中国贫民、病人、孤独、疯狂者等方面的详细情况，因为贝氏正在收集资料以研究全球贫穷苦难的历史。马礼逊则转请东印度公司的医生李文斯顿代作详细调查。李医生就此论题写出的文章，刊载于马礼逊与米怜于1817年在马六甲英华书院出版的《印支搜闻》(Indo—Chinese Cleaner)季刊上，并另行直接寄给贝博士。另有赫奇尼(Hackney)一家园艺公司为搜集全世界各地之植物，曾致函马礼逊请求代为收集中国野生植物之种子，后亦为李医生代为进行。<sup>5</sup>1820年，马礼逊与李文斯顿在澳门开设一个诊所，主要治疗眼病，也兼治内外科疾病。他们不仅为穷人治病，还注意研究和考察中医的治疗方法。他们在诊所里建了一个小型中文医学书籍图书馆，拥有中文医学图书达800册。他们还聘请了一位很有名的中医和药剂师来诊所服务。诊所开办不及数月，就有300人求诊。<sup>6</sup>皮尔逊有时也来帮忙。这个诊所并没有维持多久，因马礼逊1823年回国休假不得不关闭。对于这个诊所，汤森评论道：“它可以被视为是一批同类机构的先行者，他的建立与在东方传教的基督教传教士密切相关。它也证明了马礼逊希望诊所成为基督教传教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的想法，是切实可行的。”<sup>7</sup>

1827年，郭雷枢以东印度公司医生的身份来到澳门。在他眼里，初来中国最令人惊异的，并不是异于西方人的服饰和陌生的语言，而是随处可见的人们的病痛和被各种不堪入目的疾病折磨着可怜的人群。最严重最无助的是盲人，那些盲眼老人用拐杖探路，艰难前行，成群的乞丐紧随着人们求得施舍。这些都给他

<sup>1</sup> *Chinese Repository*, vol. 3, p. 427

<sup>2</sup> *Chinese Repository*, vol. 2, p. 270

<sup>3</sup> Edward V. Gulick, *Peter Parker and the Opening of China*, p. 58

<sup>4</sup> Edward V. Gulick, *Peter Parker and the Opening of China*, p. 48, p. 60.

<sup>5</sup> 李志刚：《基督教早期在华传教史》，台湾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244页

<sup>6</sup> Broomhall Marshall, *Robert Morrison, A master Builder*, p.106

<sup>7</sup> [英]汤森著，王振华译：《马礼逊——在华传教士的先驱》，大象出版社，2002年，第102页



以极大的震动。<sup>1</sup>经过他的努力，加上东印度公司的有力赞助，他创办了澳门眼科医院。除来自澳门的人之外，也有其他地方的人前来求诊。到1832年10月，他共诊治患者达4000人之多。<sup>2</sup>这所医院因郭雷枢不堪重负而在1832年底关闭。

在他们之后，还有一些西方医生和传教士在传播西医方面进行过努力。1828年，白拉福（James H. Bradford）医生在广州开办了一家免费诊所。这个诊所规模不大，没有住院病房，但他们治愈了大量的患者。诊所存在了六、七年之久，直到白拉福因健康问题回国为止。<sup>3</sup>来自德国的郭士立（Rev. Charles Gutzlaff）与美国传教士雅裨理（David Abeel），在南洋一带及中国沿海活动时，也曾借助施医赠药作为传播宗教的媒介。尤其是郭士立，是初期来华传教士中的著名人物之一，较早提出以医务传道作为传教的重要方式。他在中国沿海航行传教期间，就向天津和江南一带的贫困阶层行医施药，以赢得人们的好感和信任。在福州的时候，他“几乎没有一天空着，但还是有100多个病人没有接受治疗。这样的情况远近闻名，有人甚至从50英里外的地方赶来。”<sup>4</sup>

马礼逊等人在澳门、广州所开设的医院及诊所，主要是靠自己的力量及东印度公司的支持，而不是由基督教教会主持开办的。综观1807年至1834年在澳门、广州等地这些基督教人士所做的医药工作，虽然在传播西方医学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就，但并不专业化。他们并不是真正的传教医生，这些活动也不是严格意义的医务传教工作，但他们的活动在中国民众中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他们在中国所做的这些医药工作，对于那些想到中国发展传教事业的基督教会组织是个很大的启发，并且为后来的医务传教活动积累了经验和打下了基础。

## （二）近代基督教新教医务传教的形成和初步开展

### 1. 伯驾来华及其医学实践

伯驾（Peter Parker, 1804-1889）是近代基督教新教在中国从事医务传教的第一个传教医生。他于1834年在美国耶鲁大学获医学和神学博士，并取得医生文凭。受美部会派遣，他于同年6月4日坐船来华，10月6日到达广州，后又来到澳门，并于12月南下新加坡学习汉语。在新加坡期间，他曾开设一诊所，专为华人疗病，从1835年1月到10月共治疗了一千多病人。<sup>5</sup>

1835年11月，伯驾又回到广州。不久，他开办了广州眼科医院（又称新豆栏医局），这是近代中国第一家眼科专科医院。这所医院的开办标志着以行医治病为主要手段的医务传教方法正式形成，是西方医学在鸦片战争后向中国大规模输入的前奏，它使中国医学从此开始经历前所未有的变革。伯驾选择眼科是因为眼病在广东比较普遍，并且中医对此束手无策。据他给美国传教总部的第一份季度报告说，他的医院租用当地商人的楼房，可以接纳200个病人候诊，收留40个患者住院。<sup>6</sup>除了治疗眼病，伯驾也治疗其它治病，很多时候要进行手术。外科手术特别引起人们的关注，成功治疗的消息常常不胫而走，在民众中产生了不少影响。在广州医院开办的头两个月内，麻醉还没有使用，他就切除了一个巨大而危险的肿瘤。1836年，他为中国病人做了第一例截肢手术。1838年，有一个病人下颊生出肿瘤，伯驾为他成功地加以切除。1844年，伯驾第一次为一位病人作了膀胱结石切除手术。在当时的中国这类疾病是极为常见的，伯驾的成功具有很大的

<sup>1</sup> Harold Balme, *China and Modern Medicine, A Study in Medical Missionary Development*, London, 1921, p.31

<sup>2</sup> 李志刚：《基督教早期在华传教史》，第245页

<sup>3</sup> *Chinese Repository*, vol. 2, p. 276

<sup>4</sup> *Chinese Repository*, vol. 2, p. 538

<sup>5</sup> Edward V. Gulick, *Peter Parker and the Opening of China*, p. 54

<sup>6</sup> Edward V. Gulick, *Peter Parker and the Opening of China*, p. 57

示范意义。1846年，乙醚麻醉术在西方首次得到应用。次年，伯驾就将其介绍到中国。到了1848年，他又开始使用氯仿麻醉剂实施外科手术。<sup>1</sup>麻醉术的使用更使他在短短几个月内赢得了巨大的声誉，无怪乎有人评价他用手术刀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不但在中国开创了后来成为传教站支柱的新式传教事业，同时也架设了与中国人新的交流渠道。”<sup>2</sup>

伯驾很重视病案的记录和管理，他对于每一位病人的情况都有较详尽的记载。自1835年11月4日医院开始营业至1836年11月4日，医院就诊病人达2152人次，一年之中诊治的眼病有47类，其他病例23类，女性癌症病不治者有5宗。<sup>3</sup>由他开始的病历纪录，也逐渐形成了正规的体系。为了在观察和检查病人身体方面有条不紊，医院开始使用专门的记录簿，通过表格详细描述病人的基本情况。此后，医务传道会所属的每个医院都对重要的病例进行记录并报告，为以后的医学研究提供了宝贵的文献。

1837年，伯驾挑选一些中国青年跟他学习医药学和英文，并在医院里帮助做配药以及手术助手方面的事情。他是中国西医教育工作的开创者，是教育中国学生的第一个外国医生。<sup>4</sup>医院开办之初，他还不敢在医院里公开传教，只是通过与病人的接触来了解他们对宗教的看法。鸦片战争结束以后，在医院再次开张时才开始公开传教。他在为病人手术前把有关教义的小册子送给病人，让他们自己阅读，手术后再同病人宣讲教义内容。

1838年7月，伯驾在澳门又开办了一所医院。由于没有其他传教医生的帮助，他于当年10月1日关闭该院回到广州。在这几个月中，他共诊治了700个病人。<sup>5</sup>1840年6月因鸦片战争爆发，他不得不关闭了广州医院。在1840年6月到1842年10月间，他先后到美国、英国和法国的一些城市游说，不断向商界和医学界发表演说，宣传在中国从事的医务传教事业。这使他得到大批捐款，为其在中国长期从事医务传教活动提供了物质上的保证。直到1842年11月，他才回到广州重新恢复医院的业务。

恢复医院的正常业务后，病人数量日增，每天平均赴诊的病人约二百至三百人。有时甚至达到六百人，医院事务日趋繁忙。伯驾1845年的报告表明，从医院成立到1845年7月共为18000多名患者解除痛苦。<sup>6</sup>医院在伯驾主持期间，也聘用中国人为传译及配药助理。此外，郭雷枢、安德逊两位医生也常来帮忙。在中国传统医学中，诊断、治疗、配药几乎都由医生一人负责，一医多能，而近代医院通常一人一科。随着医院的建立，西方医院的管理方法也被伯驾带到中国。在病人进入医院后，伯驾先发以竹片制成的长方形号牌，然后病人按照号牌上的号码，循序进入诊疗室。这种方式后来被教会医院普遍运用，就是我们所熟知的挂号制度。从而，医院可以管理日益增多的病人，并提高了效率，使医疗活动能够有序进行。

伯驾的大获成功，得到了各阶层人士的信任与尊敬。英国商务监督义律也在一份报告中称赞伯驾：“他以最安全、最聪明、最捷近的方式，在地球的这片广

<sup>1</sup> 马伯英等著：《中外医学文化交流史——中外医学跨文化传递》，文汇出版社，1993年，第338-339页

<sup>2</sup> Edward V. Gulick, *Peter Parker and the Opening of China*, p. 55

<sup>3</sup> William Warder Cadbury and Mary Hoxie Jones, *At the Point of Lancet—100 Years of the Canton Hospital, 1835-1935*, P. 46

<sup>4</sup> Edward V. Gulick, *Peter Parker and the Opening of China*, p. 55

<sup>5</sup> *Chinese Repository*, vol. 2, p. 414

<sup>6</sup> *Chinese Repository*, vol. 14, p. 449

阔区域，大步推进文明和真理的事业。”<sup>1</sup> 1855年，该医院由传教医生嘉约翰(John Glasgow Kerr)接替负责。1856年，医院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被焚毁。1859年1月，嘉约翰在广州南郊重新建立医院，更名为博济医院。

## 2. “中国医务传道会”的成立

郭雷枢和伯驾从一开始就认为医务传教如果要很好地开展下去，就必须有一个统一的组织。1835年底，郭雷枢在《中国丛报》上发表了题为《关于任用医生作为对华传教士的商榷书》(Suggestions with Regard to Employing Medical Practitioners as Missionaries to China)，明确提出医务活动能为西方文化的输入提供机会，表达了当时当华新教传教士的共同看法。他认为要想引导中国人“精神反省”，唯一的办法是在他们中间展开慈善活动和展示人道的德行。他呼吁西方“医务界的善士们前来做好事，以博取人们的信任，由此而为逐渐接受那美好的基督教铺平道路”。<sup>2</sup>

1838年2月21日，在广州外商总会召开了“中国医务传道会”(The 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 in China)的正式成立大会。参加大会的约有十几人，其中包括一些英美商人和其他人士。大会选举郭雷枢任主席，伯驾、裨治文等4人任副主席。大会确定了传教医生的职责、医生的资格，并讨论了设立图书馆、博物馆及其他事项。这个组织成立的宗旨是：“通过为中国人治病，向他们传授医学知识和上帝的福音，使他们消除长期存在的偏见和民族排斥情绪，使他们认识到他们所仇视的人有能力并且愿意帮助他们摆脱苦难。……不仅使他们与外国人更加广泛地友好交往，而且向他们传播欧美的艺术和科学，最后向他们宣扬上帝的福音来消除他们脑子里的迷信思想。”<sup>3</sup>

中国医务传道会的目标和内容主要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sup>4</sup>

①旨在鼓励在中国人中传播医学，并提供机会进行基督教的慈善活动和社会服务；

②旨在将“西方的科学、病人调查及新的发现”所带来的益处在中国人当中传播开来；

③旨在建立信任和友谊，从而将基督福音传给异教的中国人；

④旨在激发人们以科学精神探求真理，反对迷信和愚昧；

⑤旨在为解除人类的痛苦做贡献，治愈疾患；

⑥旨在教育和培训西医学中国青年人才；

⑦旨在以将来中国出现的科学发现来提高和普及医学。

医务传道会除通过眼科医局专治眼科外，决定以后还要增设外科、耳科、皮肤科、妇科和儿科等，以扩大与中国人的接触范围。“中国医务传道会”是第一个将医学和传教事业结合为一体的社会组织。它的成立，使传教医生在华从事的医务活动成为一项独立的事业，并有了一个专门管理调控的机构和较为稳定的经济后盾。

这一时期是基督教医务传教的开创阶段。由于清政府的禁教政策，传教士的活动最初只能局限于澳门和广州以及华人聚居的南洋等地，传教医生也不敢公开进行传教活动。他们通过医疗活动和与中国基层社会有所接触，但传教工作进展缓慢。到此时为止，西方医学所取得的那些新成就还没有真正传到中国来。但经过

<sup>1</sup>[美]乔纳森·斯潘塞著，曹德骏等译：《改变中国》，三联书店，1990年，第44页

<sup>2</sup>赵春晨、雷雨田等：《基督教与近代岭南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55页。

<sup>3</sup> Chinese Repository, vol.7, p.33

<sup>4</sup>Harold Balme, *China and Modern Medicine, A Study in Medical Missionary Development*, p.42

几年的经营毕竟建立了几所教会医院，并成立了统一的组织机构，为后来医务传教的广泛开展打下了基础。

### （三）鸦片战争与医务传教活动的广泛开展

在鸦片战争之前，早期来华的传教医生是零星的，教会医疗事业的发展很有限。传教医生主要以个人的力量开办医院，并且时断时续。医院的规模都不大，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只能算是诊所。鸦片战争后，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使传教士获得了许多特权。《中美望厦条约》中规定：“合众国民人在五港口贸易，或久居，或暂住，均准其租赁民房，或租地自行建楼，并设立医馆、礼拜堂及殡葬之处”。<sup>1</sup>《中法黄埔条约》中也规定：“佛兰西人亦一体可以建造礼拜堂、医人院、同医院、学房、坟地各项”。<sup>2</sup>这些条约的规定为传教医生在通商口岸设立医院提供了依据，也为医务传教提供了法律保护。从而，中国医务传道会认为“我们传道会的工作再也不会局限在帝国一隅，医院也不会限制在一个地点，……准备在一定程度上利用这些新开辟的通商口岸。”<sup>3</sup>此后，传教医生开始在通商口岸合法地进行医务传教，并设立医院、诊所。

1841年1月，英军占领香港。1842年《南京条约》签订后，大量移民涌入香港，使得狭小的港岛变得拥挤不堪，加上气候炎热和潮湿，经常流行疟疾、痢疾和黄疸病。1843年，为适应病人大量增加的治疗需要，港英当局开始委派医务官员，同时在香港成立公共卫生和清洁委员会。1843年6月，英国伦敦会传教医生合信（Hobson B.）来到香港主持开办了第一家西式医院。1845年，在香港的医务官员和传教士组织成立了“中国内外科学会”，由英国海军医生塔克（Tucker）任会长，合信任秘书，成员共7人。该学会主要目标在于加强医药学方面的交流，对关乎大众健康的诸如流行病等问题展开讨论。学会下设图书馆以及博物馆。他们和内地教会医生有密切的关系，定期召开医学讲座会。1848年初，伦敦会派赫希伯格（Hirschberg）来接替合信负责医院工作，并新开了两家诊所，一个设在九龙一个中国基督徒开办的学堂里，另一间则设在伦敦会的一个教堂里。赫希伯格在香港工作到1853年，后转到厦门。<sup>4</sup>

在广州，由伯驾创办的眼科医院，在鸦片战争进行期间一度停止活动。广州辟为通商口岸以后，这里很快便门庭若市。1848年，合信离开香港来到广州。不久，他在金利埠创办了惠爱医院。一批先前已经入教、粗通医学的人，如梁发、梁佳臣、卢挺善、周勤堂等人供职其中。同年，来自美国的传教士也在这里办起学校和赠医所。<sup>5</sup>嘉约翰（Kerr J. G.）是美国传教医生，1854年受长老会的委派来到广州，在伯驾的眼科医局当医生，同时为长老会筹设惠济医局。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嘉约翰回到美国，一边继续在母校进修，一边为在中国医务传教进行游说和募捐，并陆续购买了一批医疗器材，战争结束后他又重返中国。广州的眼科医局和惠济医局在战争中都毁于战火。1859年，嘉约翰在广州南郊重新开设了一个医院，这就是中国著名的教会医院——博济医院。由美部会派来的传教医生波乃耶（Dyer Ball）早于1839年就从新加坡来到澳门，1843年到香港开办诊所，行医传教。1845年他到达广州，建立了教堂、诊所、学校等。由于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爆发，他不得不退居到澳门，他在广州的医学事业遭受了损失。另外，由美

<sup>1</sup>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三联书店，1982年，第54页

<sup>2</sup>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三联书店，1982年，第62页

<sup>3</sup>Chinese Repository, vol.2, p.190

<sup>4</sup>William Lockhart, *The Medical Missionary in China: A Narrative Twenty Years' Experience*, pp. 202-204

<sup>5</sup>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51页

国长老会派来的哈巴安德（Andrew Patton Happer）医生于1851年在广州开办惠济医院。他毕业于宾西法尼亚大学，获医学博士学位。他1844年来华，先后在澳门、广州两地行医、办学和传教。<sup>1</sup>

宁波于1844年1月正式开埠，最先到来的是美国浸礼会医生玛高温（Daniel Jerome Macgowan）。他既是来宁波的第一位传教医生，也是美国浸礼会在华开辟传教事业的第一人。他于1843年奉命来华，11月到达宁波。不久，他在宁波城内办起诊所，主要诊治眼病患者。1845年4月，他重新建院，而且还从国外得到一批捐赠。1848年，这家医院接受病人4671人次。由于多方面原因，医院几度停办，在此期间他就去巡回施诊。1848年，他在报告中说，他从中国人那里学到一种可以戒除烟瘾的中药疗法，应用后很有效。他还对宁波的中国医生进行有关人体解剖和生理知识的特殊演讲，希望能激起他们对西方医药的兴趣和认识。1854年他还发行了一份名为《中外新报》（Chinese and Foreign Gazette）的中文杂志，介绍西方科学、医学和宗教。他试图让中国医生也学习西医和应用西医学，但当地人救治疾病时大多还是使用中医药，除了眼科疾病，信任外科手术者并不多。<sup>2</sup> 1844年6月，美国长老会的麦嘉缔（Davie B. McCartee）到宁波传教，在自己的家里开了诊所，也经常义务出诊。1855年，伦敦会传教医生派克（William Parker）从上海到宁波，也建立了一所医院。他的工作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但由于妻子染霍乱而死，他于1859年离开宁波回国。<sup>3</sup>

1843年11月，上海正式开埠。上海开埠后，首先在上海建立教会医院的是伦敦会的传教医生雅魏林（William Lockhart）。他于1844年2月抵达上海，随即开办上海最早一家西式医院，地址在南市附近的一所中国民居里。1857年底他离开上海后，伦敦会委派合信任仁济医院院长。合信离开后，又有柯林斯（Rev. Collins）、韩德森（James Henderson）等人相继主持该院工作。随着仁济医院的建立，其他一些传教医生也先后来到上海。1848年，美南监理会传教士泰勒（Chas. Taylor）到上海开设诊所，五年后回国。1854年，由凯利（Rev. Kelley）医生接替他的工作。1852年，美国浸信会的伯顿（G. W. Burton）来到上海从事医务工作。1855年，美国圣公会的菲什（M. W. Fish）医师到上海，在圣公会教堂附近设诊所行医传教。另外，内地会的创建人戴德生（Hudson Taylor）曾于1854年到达上海，也做了一些医务工作。<sup>4</sup>

厦门于1843年11月开埠。早在鸦片战争期间，美国传教士雅裨理、舜为仁（William Dean）、文惠廉（Rev. Boone）、麦毕烈特（Thomas MacBride）、娄理华（Walter Lowie）就相继来到鼓浪屿和厦门。1842年6月，雅裨理、文惠廉与坎明（Henry Cumming）一起在鼓浪屿开设一小型诊所，诊所就设在雅裨理的家中。这间诊所不为医务传道会所认可，因为坎明不属于任何差会，但他依靠自己的力量和热情为病人治病，同时也进行布道。这间诊所后迁移至厦门。1843年，美国长老会医师赫伯恩（James Curtis Hepburn）来到厦门，开始与坎明一起工作。诊所旁边的一座房子专门租来供病人住院，这是第一家开始有床位的教会医院。来求诊的人越来越多，从1844年2月1日到来年7月1日，收治病人1862例。

<sup>1</sup> Edward V. Gulick, *Peter Parker and the Opening of China*, pp. 73-74

<sup>2</sup> *Chinese Repository*, vol. 15, p. 342-345

<sup>3</sup> Harold Balme, *China and Modern Medicine, A Study in Medical Missionary Development*, p. 206

<sup>4</sup> William Lockhart, *The Medical Missionary in China: A Narrative Twenty Years' Experience*, pp. 281-282

<sup>1</sup>后由于健康原因，赫伯恩返回美国。他于 1859 年重返远东，被派赴日本传播西医。除此以外，这一时期先后来厦门的传教医师还有几位，但都因为健康问题而被迫中断他们的活动。1845 年后，厦门的外国人越来越多，医务传教事业也逐渐发展起来。

福州于 1844 年 7 月正式开埠。教会医院在福州出现得较晚，来福州的传教医生也不多。最早在福州开办诊所的是美国美以美会的柯林和怀特(M.C.White)柯林 1845 年毕业于美国密西根大学，1846 年奉命来华，9 月到达福州。1848 年 2 月，经与怀特会商，他创办了一所男童学校。同时，他们也创办了福州第一个西式诊所，经常给当地的穷人看病。他 1851 年离开福州，同年回国。1851 年美以美会的威尔纳(Wiley)来继续这里的工作，直到 1854 年回国。1850 年英国圣公会的温敦(William Welton)也来到福州，在福州乌石山一带施医传教。他于 1856 年秋回上海，翌年回国。<sup>2</sup>

随着鸦片战争的结束和中国通商口岸的开放，越来越多的传教医生来到中国开展医务传教活动。从伯驾开始的医务传教活动，在鸦片战争前后开始成为英美新教各差会和医学界、商人共同参与进行的一项规模巨大的事业。基督教医务传教事业开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其特点是：①不再仅限于澳门、广州，而是扩展到香港和新开放的几个通商口岸；②来华传教医生的人数大量增加；③医务传教活动受到中国医务传道会和基督教各差会的大力支持。在这种历史大背景下，雒魏林作为传教医生也来到了中国。

---

<sup>1</sup> 李志刚：《基督教早期在华传教史》，第 204 页

<sup>2</sup> William Lockhart, *The Medical Missionary in China: A Narrative Twenty Years' Experience*, pp. 217-220

## 二. 雒魏林在中国的活动

### (一) 在东南沿海地区的医务传教活动

#### 1. 在澳门和舟山的医务活动

1811年10月3日, 雒魏林出生于英国的利物浦。他曾在都柏林和伦敦的两家医院学习医学, 后毕业于伦敦盖伊医院, 1833年取得行医资格。鸦片战争爆发之前, 英国传教士大多在南洋马六甲、巴达维亚、槟榔屿、新加坡等地活动。到1838年, 伦敦传教会看到伯驾在华医务活动有明显的效果, 同时也需要传教医生到华南充实该会, 才决定也派遣传教医生前来中国。此时身为利物浦外科医生的雒魏林得知这一消息, 表示愿意献身于对华传教事业。经伦敦传教会的批准和短期筹备后, 他于1838年7月31日乘船离英来华, 他也成为受医务传道会资助的第一位传教医生。<sup>1</sup>

11月中旬, 雒魏林首先到达了巴达维亚。1839年1月, 他到达广州后先学习了一个多月的汉语, 汉语教师是伦敦会聘用的中国助手朱德郎。因为清政府此时仍然例行禁教政策, 雒魏林在广州无法开展行医传教工作。1839年2月28日, 他又来到澳门, 当地的英美商人和伯驾一致主张澳门医院由他重新开诊营业。澳门医院是伯驾于1838年7月开办的, 当时可以容纳200名病人。由于广州眼科医院在1838年冬重新开放, 伯驾在10月关闭了这所医院。<sup>2</sup>1839年4月, 林则徐下令关闭洋行, 但雒魏林所在的澳门并没受到多大影响。只不过他当时正忙于学习汉语, 虽然偶尔会给一些急诊病人看病, 但医院直到7月1日才正式开始限量接纳病人。但到了8月间, 中英关系渐趋紧张, 林则徐把所有的英国人驱逐出中国境内。8月底, 雒魏林只得把医院停业。9月初, 他又前往巴达维亚, 在那里跟英国传教士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继续学习中文。在此期间, 共接受病人167例, 均为门诊病人。<sup>3</sup>

1840年5月, 雒魏林又悄悄返回澳门。不久, 他又重新开起了澳门医院, 并得到了传教医生戴弗尔和合信的帮助。英国正式发动鸦片战争后, 他把澳门医院交给合信负责, 奉命跟随英国军队乘兵船前往浙江定海开设医院。<sup>4</sup>舟山群岛在鸦片战争中曾两度被英军占领, 第二次占领一直持续到1846年。在此期间, 有不少新教传教士访问过舟山。雒魏林是这一时期在舟山活动时间最长的传教士。1840年9月, 他在定海开设了一个诊所。开始时, 当地人不信任西方人开的诊所, 很少有人前来就诊。雒魏林就主动在大街上进行宣传, 向行人散发传单, 逐渐吸引了一些病人。<sup>5</sup>由于水土不服, 传染病在英军中流行, 因此他还负责给驻扎该地的英军治病。到次年2月, 英国侵略军从舟山撤退。他害怕没有保护, 把刚开了四个多月的诊所关掉, 跟随英国兵船又回到澳门。在此期间他诊断了不少病人, 据他估计不少于3500人, 病人得的主要是感冒和其他疾病。“大量的人来到诊所, 不仅来自舟山的偏远地区, 而且来自内陆的各个地区。居民像信任一些长期建立起来的医院一样信任外国医生, 我在那里已经和居民建立起了良好的关系。”<sup>6</sup>

<sup>1</sup> Edward V. Gulick, *Peter Parker and the Opening of China*, p. 74

<sup>2</sup> Edward V. Gulick, *Peter Parker and the Opening of China*, pp. 72-73

<sup>3</sup> *Chinese Repository*, vol. 8, pp. 625-628

<sup>4</sup> Alexander Wylie, *Memorials of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to the Chinese*, p. 125

<sup>5</sup> William Lockhart, *The Medical Missionary in China: A Narrative Twenty Years' Experience*, p. 125

<sup>6</sup> William Lockhart, *The Medical Missionary in China: A Narrative Twenty Years' Experience*

在舟山，他发现中国人自杀的情况很多。“他们的自杀方式大多是吞食鸦片、上吊和投河，还有些富人会通过吞食金子和砒霜自杀。在医院里，我们唯一能处理的是吞食砒霜的自杀。”<sup>1</sup>他认为人们自杀的原因有很多，但最主要的是对生活的失望和复仇。

通过这次在舟山的短期试验，雒魏林建议英军以后每占领一块地方，医务传道会应立即派代理人去建立医院。在他给医务传道会的报告中称：“舟山群岛已置于英国势力之下，医务道教会必要派出一位代理人，到该地区的首府建立医院。为尽可能地解除当地百姓的病痛和实现医务传道会的目的，可以在这个新的军港试验这种手段，以获取百姓思想上有益的影响。”<sup>2</sup>他认为这样做可以赢得人心，以巩固英军的占领。

1841年2月回到澳门后，他又开始把澳门医院继续办下去。不久，他和寄居澳门的一位英国女子结婚。当香港被英国占据后，他于1842年到了香港。他希望能再次去舟山开展医务活动，但一直等到1843年春。在此期间，他掌管着医务传道会在香港的医院。1843年6月13日，雒魏林奉伦敦传教会之命带着他的妻子，以“中国医务传道会”的名义再次到舟山开设诊所。1843年7月，他还和米怜在宁波逗留了几天，这段时间大约有两百人来看病，其中有几个患有白内障的人。<sup>3</sup>在舟山呆了几个月，他又医治了几百名病人。中国医务传道会在年度报告中高度评价了他开办舟山医院的情况：“当病人一旦摆脱了中国官吏的监督和限制，就会为分发宗教书籍和自由布道提供宽松的环境。圣经中合适的章节和宗教小册子都自由地分发到住院病人的手中。……当向他们解释圣经的神圣教义时，他们至少是带着专注和敬仰的深情。”<sup>4</sup>

1843年底，他乘英国兵船两次到上海，调查建立传教据点和医院的可能性。在向香港伦敦传教会负责人的报告中，他认为上海的战略地位远比舟山重要，上海“对于医务传教会计划的成功进行可以提供不寻常的便利”，<sup>5</sup>应在上海建立永久性的医院设施。经伦敦传教会研究，决定关闭舟山诊所，命令雒魏林到上海觅址创办医院。

## 2. 在上海的活动

1844年1月，雒魏林关闭了在舟山的诊所，带着妻子前往上海。2月中旬，他在县城南门附近租用了一座房屋办起了医院，开始向周围居民施医送药并开始传教。<sup>6</sup>因拓展业务的需要，这所医院经多次搬迁扩建。医院地处北门外，属于华界，且房屋的外形为中式，又专为中国百姓治病，又称中国医院。它又曾一度迁到山东路，改名为山东路医院，最后定名为“仁济医馆”（1932年正式定名为仁济医院）。实际上，医院是二层楼房，大门内有大厅一间，为候诊之所，内为病室，分为上中下三等。凡无力延医者，均往该院诊治。<sup>7</sup>

---

, p. 125

<sup>1</sup> William Lockhart, *The Medical Missionary in China: A Narrative Twenty Years' Experience*

, p. 49

<sup>2</sup> *Chinese Repository*, vol. 10, pp. 453-465

<sup>3</sup> William Lockhart, *The Medical Missionary in China: A Narrative Twenty Years' Experience*

, p. 236

<sup>4</sup> *Chinese Repository*, vol. 12, pp. 189-190

<sup>5</sup> Alexander Wylie, *Memorials of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to the Chinese*, pp.112-113

<sup>6</sup> William Lockhart, *The Medical Missionary in China: A Narrative Twenty Years' Experience*

, p. 236

<sup>7</sup> 王尔敏：《上海仁济医院史略》，载林治平主编《基督教与中国现代化》（论文集），台北，1994年，第413页



这所医院是上海最早的西医医院，其建设费用主要由英国商人、侨民捐赠和香港医学会募捐。这所医院的开设标志着基督教医务传教事业在上海的开始。这所简陋的医院，实际上也是上海最早的新教传教事业中心。在治疗病人的同时，医院也为“受难的人们”提供了“忏悔”的机会，同时也起到了教堂的作用。这所医院的宗旨“即是服务的历史，为受难的人们服务”。<sup>1</sup> 雒魏林曾得意地夸耀说，真理找到了通向那些若无医院将从不知福音之人心灵的道路，任何其他手段都无法取得如此有效的成就。虽然刚开始医院条件比较简陋，但因免费施诊，也吸引了很多病人。伦敦会除了这所医院外，在城内教堂里也开设小诊所，每周二、五施诊服务。雒魏林还利用侨民的资助设立基金会，建造了一座楼房，内设有门诊大厅和宽敞的病房。医院的声望也日渐响亮，越来越多的病人前来求诊。<sup>2</sup> 到1845年6月底，已有万余病人就诊。在开头二年，已达到19,000人次，1847年有15,000名病人就诊。当时也有大量的瘾君子来医院戒烟，虽然他为一些人成功地戒除毒瘾，但总的来说，他对此并不是太乐观，因为他认为大多数戒烟的人自己本身缺乏信心。

在建立医院的同时，他对医院实行西方现代式的经营管理模式。王尔敏评价他说，“不但是一个仁慈医生国手，救治群生，亦且在一个组织机构机制而言，也是一个创业典范。对仁济医院开创体制，雒魏林一开始即奠定有效体制、良好基础。”<sup>3</sup> 1846年，他首先在上海组织中华医务传道会上海分会，推选董事四人，以商业人士为主，形成医院的最高监察机关。其职责在于评估医院发展前景，并积极筹募资金。分会每年开会一次，医院工作即由分会任命的七人委员会推动。七人委员会中，三位法定人数须由捐款人每年选举任命，而捐款人每年捐银元五元以上者即获得在年会的投票权。这样一来，医院的工作就处于捐款人和教会的实际控制之下。为维持免费诊病，医院还向社会募捐。同治十一年(1872)《申报》载“医馆募捐”：“仁济医馆之设也，规模创建固已历有年所矣。现在就诊之人日益多，开销之费日益大，从前捐数所人不敷，今拟重行广募集资事”。<sup>4</sup>

雒魏林与英国医学界人士一直保持着较为密切的联系，这使得医院往往能够及时接受近代西医学的最新发现和发明，并很快应用于临床。从而使上海跟上了世界先进医疗技术的发展潮流。如1849年在西方出现了氯仿麻醉法，第二年仁济医院就将其应用于外科手术中。1875年，西方施行了第一例无菌手术，一年后仁济医院的重要外科手术均在无菌状况下进行。<sup>5</sup> 随着无菌消毒方法的进一步改进，手术人员开始重视清洁并穿戴灭菌手术衣、手套和口罩，手术室内的大量围观者也被禁止进入。这些都为当时的中国教会医院及时采纳。仁济医院开创了外科消毒法在中国的率先应用，标志着医院已具有相当高的医疗技术水平。

同时，在教会医院的影响之下，在上海也出现了施医公局一类免费的医药机构，这主要是由上海一些慈善人士所开办。这比传统的施医局规模要大得多。施医公局延请了许多中医专家坐堂，凡是眼科和外科方面的医药都免费提供。施医公局还为上海不同的药店轮流发放中药，并设立了一笔资金。这吸引了大量的患者，在每个门诊日都有300—500人前来就诊，特别是在夏天的几个月时间，人满

---

<sup>1</sup> 葛壮：《宗教与近代上海社会的变迁》，上海书店，1999年，第121页

<sup>2</sup> William Lockhart, *The Medical Missionary in China: A Narrative Twenty Years' Experience*, p. 238

<sup>3</sup> 王尔敏：《上海仁济医院史略》，载林治平主编《基督教与中国现代化》，1994年，第399页

<sup>4</sup> 《申报》1872年10月15日，医院募捐，转引自何小莲《西医东渐与文化调适》，第82页

<sup>5</sup> 何小莲：《西医东渐与文化调适》，第80页

为患。<sup>1</sup>

传教医生开设医院,是为了接近中国民众,通过医治疾病以取得病人的好感,从而达到发展外国教会势力和缓和中国人民反抗的目的。早期在上海活动的英国传教士麦都思、慕维廉(William Muirhead)、艾约瑟(Joseph Edkins)等,就经常轮流到仁济医院向病人传教和散发福音书。同时,他们也到设在上海县城内的分诊所去,向病人传教。

雒魏林在报告中介绍了医院一天的日常活动,“医院每天早上七点半打铃,所有住院病人凡能走动者,包括仆人和家属,都必须到大厅内集合去听牧师用中文讲道,同时参加祈祷。在九点,医院提供病人可能需要的药品。到十一点半,铃声会响半个小时来提醒医院正式开始日常活动。在外面等候的病人立即集合起来,接受为他们而进行的宗教服务。下午门诊开放前,所有候诊病人及陪同来的家属,也必须集中听外国牧师讲道。……女人和男人们分批进入,由看门人发给竹签。病人们按照竹签上的号码分成两队,在大厅集合。然后,他们逐个接受医生的检查,并领取药品。需要进行特殊治疗或手术时,要等到全部病人检查完毕之后进行。……在晚上我们也看望住院的病人,以防突发事件。”<sup>2</sup>来医院看病,不管病人愿意与否,一概先听道后看病。对于那些起不了床的重病人,传教士就去他们病房里讲道。他在信中说道,每周三次由麦都思等向病人集体布道,每次参加的女性30-60名之间,男性在50-80名之间,有时会更近些。集会时,他会“应他们的要求,发放宗教小册子和书籍,以让他们病愈回家时随身带上以赠给他们的亲友。”对于传教士在医院向病人发放传教小册子,他认为,在这样的环境下,大多数病人会“怀着崇敬之心诚心地”予以接受。<sup>3</sup>

1844年12月,他在给中国医务传道会哈克尼援助会(Hackney Chinese Association in Aid of the Medical Missionary in China)的信中写道:“我一到上海就开始医疗活动,开始的时候在麦都思家里进行。5月,我和家人搬进了新的住所,病人因此也有不错的居住条件。当我为人治病的消息一传开,病人们就成群结队而来。从2月中旬至今,共有10,000名病人前来求诊,给他们配的药物疗程长短不一。……不少病人还从苏州、南京、镇江及其他许多地方前来求诊,甚至还有的来自崇明岛。这些病人与我同住一段时间后,大多都带着一定剂量的药品及相应的用药说明回家。医院刚营业就得到这么多人的信任,真令人兴奋。”<sup>4</sup>

在施医的过程中,他定期向医务传道会提供医院的医学报告,详细记录了每年的病人数量及主要病例。1844年5月到1845年7月的医疗情况,据他呈送中国医务传道会的报告称,自从医院在上海建立,雒魏林一直在努力向当地人介绍疫苗接种,并对从香港医院发送过来的淋巴液进行了反复试验,使用之后发现相当有效。他给上海的中国驻军长官的一个女儿接种疫苗,他其余的子女及所辖士兵的30名子女,还有附近的儿童后来都接种了疫苗。除此之外,还有20名外地儿童也在医院接种了疫苗。疫苗接种也被当地的医生使用。一位来自苏州的中医向他请教种痘的方法,他进行了演示并赠给他疫苗。那位中医回苏州后,给当地

<sup>1</sup> Chinese Repository, vol. 12, p. 212

<sup>2</sup> William Lockhart, *The Medical Missionary in China: A Narrative Twenty Years' Experience*, pp. 256-257

<sup>3</sup> William Lockhart, *The Medical Missionary in China: A Narrative Twenty Years' Experience*, p. 128, pp. 166-167

<sup>4</sup> William Lockhart, *The Medical Missionary in China: A Narrative Twenty Years' Experience*, p. 236

的许多儿童种痘。<sup>1</sup>在此期间医院的病人总数为 10, 978 例。其中消化不良、胃痛 1434 例；咳嗽 725 例；风湿病 1275 例；角膜溃疡 892 例；角膜白斑 360 例；异状筋肉 388 例。他还进行了一些手术。其中白内障 18 例，阴囊给水 26 例，异状筋肉 2 例。<sup>2</sup>

在 1846 年 7 月至 1847 年 7 月的这一段时期，病人数量大增，是医院成立以来病人人数最多的一年，总数达到 15, 217 例。对此，他认为大概是因为当地民众对外国人有了更多信任，也与新大楼为医院及门诊病人提供了更理想的就医环境有关。年度报告称，1847 年整个春季，天花在上海及其周边地区肆虐，几乎每一家都遭受其害，许多儿童因此死亡。这一年，他还医治了一些因参加海盗而受到严重烧伤和枪伤的病人。<sup>3</sup>1847 年 7 月至 1848 年 12 月的报告称，1848 年 6、7 月潮湿的天气导致脑炎盛行，许多人在病发第七天死亡，同时也有许多人死于霍乱，在秋冬季节遭遇多年不遇的间歇性发热和腹泻。在这 18 个月中，病人数量与过去的年份基本一致，共计 14, 386 例，分 102 类。<sup>4</sup>

1849 年的年度报告称，当年春夏时节阴雨连绵，是多年不遇的多雨之年，对当地居民健康产生巨大影响。特别是胆汁质间歇性热病与痢疾肆虐，造成大量当地居民死亡。除去住院病人，本年度共有 9020 例门诊病人得到医治，病分为 113 类，位居前几位的分别是：消化不良 987 例，吸食鸦片 734 例，间歇性热病 636 例，风湿病 620 例，咳嗽 573 例，沙眼 360 例。<sup>5</sup>为了扩大医院的影响，他还上海城区城隍庙后的伦敦会小教堂内开设了一家诊所，每周开放两天，“前来就诊的病人感觉满意，许多店员及其他行业的人员因无法远赴城郊的上海医院就诊，一般都来这个诊所看病。”这个诊所在他的主持下维持了好几年。<sup>6</sup>在灾荒时期，医院每天早晨还会发放一些救济品，来帮助那些灾民。

1850 年的年度报告中，病人总数为 9, 352 例。其中间歇性发烧 674 例，风湿病 616 例，沙眼 235 例，发癣 150 例，角膜溃疡 166 例，倒睫症 166 例。<sup>7</sup>

1852 年年初，医院新开了一个厨房，经常向穷人施舍饭菜。据他叙述，这个厨房开放了九周，给穷人发放了 34, 000 碗饭。后来，又断断续续开放了几个月。购买这些食物的资金是由几个外国人提供的，他们希望帮助挨饿的人。这一年，由于健康状况不良，他的妻子和孩子不得不离开上海回到英国。<sup>8</sup>

1853 年，感冒和各种传染病在上海流行。每隔一周或者十天就会出现一次高潮，致使许多病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服用了大量奎宁。尤其到了秋天，情况更加严重。1854 年，许多为外国公司工作的中国工人受伤，被送到医院诊治。经常十个或十二个人被同时送到医院，大部分是由于事故而受伤，很多人因此而死

<sup>1</sup> William Lockhart, *The Medical Missionary in China: A Narrative Twenty Years' Experience*, p. 242

<sup>2</sup> *Chinese Repository*, vol. 17, pp. 289-291

<sup>3</sup> William Lockhart, *The Medical Missionary in China: A Narrative Twenty Years' Experience*, p. 243

<sup>4</sup> *Report of the Chinese Hospital, at Shanghai, from July 1st 1847 to December 31st 1849*, by the Committee, Shanghai, 1849, pp. 14-17

<sup>5</sup> William Lockhart, *The Medical Missionary in China: A Narrative Twenty Years' Experience*, pp. 243-246

<sup>6</sup> William Lockhart, *The Medical Missionary in China: A Narrative Twenty Years' Experience*, p. 244

<sup>7</sup> *Chinese Repository*, vol. 20, p. 153

<sup>8</sup> William Lockhart, *The Medical Missionary in China: A Narrative Twenty Years' Experience*, p. 270

去。<sup>1</sup>这年夏天，他还去上海的监狱看望犯人，希望能给他们进行一些治疗。他见识了中国刑罚的残酷，“四个被杀死的人被扔在监狱大门口，还有三个人受了枪伤，别的人也被打得遍体鳞伤。这个监狱传来犯人的呻吟声。”他要求给受伤的犯人治病，但被监狱的官员制止，不过他还是得到犯人们的感谢。<sup>2</sup>

小刀会占领上海期间，他曾试图增加病房的数量。但由于清军与小刀会作战时的炮弹常常落到医院附近，他认为增加病房不安全，就放弃了。不过，他还是给现有的病房增加了阳台，希望能使病人觉得更舒服。另外，还对医院的其他设施进行了一些改造，使医院的面貌焕然一新。他提到“在医院里养伤的清兵和小刀会成员，在这种特定情况下做到了和平相处。他们在接受医院治疗的同时，有时也会互相帮助。”<sup>3</sup>

1857年春天和秋天，传染病在上海流行，许多人因感染而失明。很多人在医院接受治疗而恢复了健康，但一些偏远地区的人因为来的太晚而错过了治疗的时机。<sup>4</sup>

在治病过程中，他注意到眼病在中国人中很普遍。他们由于眼睛发炎，又没有得到及时诊治，导致眼的结构发生变化而引起了眼疾。他觉得对于眼病，中医无法诊断，也没有办法进行治疗。另外，北方气候剧烈的变化也加剧了眼病的发展。对于一些不能按时来接受治疗的病人，他常常抱怨，“我警告他们如果不能每天按时治疗，他们将会失明。这样，他们才会隔两天来一次。但当他们发现眼病有些好转，往往会五六天不来医院。由于这样的疏忽，刚好转的眼病又恶化了。我问他们为什么不能每天都来，他们说工作很忙，不方便常来这里。”<sup>5</sup>

同时，他对某些病人不道德的表现很不满。一天，一个背部受伤并昏迷的病人被送到了医院。经过紧急诊治后，他醒过来了。醒来后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趁着医院工作人员不注意，偷走了他们的衣服，并拿到大街上去卖。雒魏林听说了这件事，很生气。但他仍认为大部分病人对医院是有感激之情的，“虽然发生了这样的事，但我们的工作还是在继续。我们的工作并不是为了获取人们的感激，而是向他们证明基督的仁慈。……希望能使他们明白基督教并不仅是一种教义，而是一种慈善的准则。甚至对于那些没有感恩之心和有罪的人，我们也会宽恕。”<sup>6</sup>同时，他也赞扬了病人家属、朋友们对病人的关怀之情，“让人高兴的是，穷人对患病的朋友关怀备至。从这些人的身上能看到人们之间真正的感情，这可以用很多例子证明。把生病的人看成累赘、把他们带到医院里却不进行护理，而只是为了摆脱他们，这样的事是几乎没有的。病人的家属和朋友们总体上做得很好，他们力所能及地满足了病人的需求。”<sup>7</sup>

---

<sup>1</sup> William Lockhart, *The Medical Missionary in China: A Narrative Twenty Years' Experience*, pp.270-272

<sup>2</sup> William Lockhart, *The Medical Missionary in China: A Narrative Twenty Years' Experience*, p.32-33

<sup>3</sup> William Lockhart, *The Medical Missionary in China: A Narrative Twenty Years' Experience*, p.269

<sup>4</sup> William Lockhart, *The Medical Missionary in China: A Narrative Twenty Years' Experience*, p.250

<sup>5</sup> William Lockhart, *The Medical Missionary in China: A Narrative Twenty Years' Experience*, p.257

<sup>6</sup> William Lockhart, *The Medical Missionary in China: A Narrative Twenty Years' Experience*, p.275

<sup>7</sup> William Lockhart, *The Medical Missionary in China: A Narrative Twenty Years' Experience*, p.249

雒魏林在行医的过程中曾经也招收了一些学生和助手，在不同程度上向他们传授医术。当然，培养中国青年，只是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他希望通过培养这些中国青年，传播西医学，以寻找到一条能促使中国百姓能完全信任和接受西学的途径。他评价说，“这些青年人先前都受过良好的中文教育，后来又学会了英文。他们在医院里既是医生的助手，又担任翻译。我对他们的造诣和在治病中显示出的才华，大为惊叹。他们中不少人离开了医院，在广东省偏远地区私人独立行医。”<sup>1</sup>并且因为工作繁忙，他对自己的学生并不能进行系统的医学教育。他的学生中几乎没有出色的人才，大都浅尝辄止，令他经常感到失望。但也有一个名叫黄春甫的青年，表现得较为出色。雒魏林评价他“学了很多内外科的医术”，“当合信因为健康原因离开中国时，他已经能够使医院的工作正常继续下去……他能很好地主刀进行一些小手术，并能为医院碰到的常见病例开处方。”<sup>2</sup>黄春甫后来接受洗礼成为基督信徒，并从事医疗工作，在仁济医院任职达43年之久。另外，还有一个学生进行了一段时期的学习后，能提供基本的医疗服务。他回到家乡后开办了一家诊所，受到当地民众的欢迎。

医院的开办是极为成功的，在1844至1856年间，这十三年医治病人总数为150,000人次。若比较看，1860年有16,113人次；1861年有38,069人次；可见历年剧增，数量甚巨。<sup>3</sup>

1857年底，由于健康状况不佳，雒魏林决定回国休养。病人们听说了他要离开上海的消息，就给他送来了牌匾。牌匾上写满了那些病人的名字和他们被治好的病，“牌匾被装饰在大厅里，对看到它的人很有吸引力，它留下了病人们美好的记忆。”<sup>4</sup>在离开上海后，他还收到了几个中国病人的感谢信。信上写道：“人们在世界上相遇，有些人做了善事，却从不谋求获得赞扬。他们随时准备帮助那些有困难的人，对于贫困的人总能给予慷慨的援助。……雒魏林医生是个有崇高精神的人，他的医学才能值得我们骄傲。他习惯于容忍别人，一直乐于做好事。他做的每一件事都带有善意。……他从不讲空话，做事很有条理，总友好地对待每个人。他以超常的忍耐心赢得了大家的拥护。……他把药分给穷人，但从来没有瞧不起他们。他解除了病人的痛苦，对于病人的治疗很有效，内在的病症也被他的治疗所抑制。他的门永远对病人开放，医院里经常挤满看病的人，而他从未觉得麻烦。他给病人建立了舒适的病房，还雇人照顾他们，却从不收费。……当他坐船回国时，我们一直远远望着，希望他能够快乐。也许明年春暖花开时，他还会回来。”<sup>5</sup>

1857年12月，他乘船离开上海，次年1月底回到英国。不久，他被任命为伦敦医务会的会长。

## （二）在中国的其他活动

### 1. 雒魏林与青浦教案

鸦片战争后，上海成为通商口岸，外国人获得了进入上海的权利。按照英国

---

<sup>1</sup> William Lockhart, *The Medical Missionary in China: A Narrative Twenty Years' Experience*, p. 140

<sup>2</sup> William Lockhart, *The Medical Missionary in China: A Narrative Twenty Years' Experience*, pp. 141-142

<sup>3</sup> 王尔敏：《上海仁济医院史略》，载林治平主编《基督教与中国现代化》，台北，1994年，第413页

<sup>4</sup> William Lockhart, *The Medical Missionary in China: A Narrative Twenty Years' Experience*, p. 282

<sup>5</sup> William Lockhart, *The Medical Missionary in China: A Narrative Twenty Years' Experience*, pp. 283-288

领事巴富尔 1845 年强迫上海道台宫慕久订立的《上海租地章程》，外国人在上海可以购地、造屋和居留，并议定“外人行走之地，以一日往还，不得在外过夜”。传教士们到达上海后，便买地建堂、设立医院，从事宗教文化活动。伴随着英国侵略势力在中国的扩张，他们的宗教活动内容日渐减少，而文化侵略的性质却与日俱增，从而引起了民教冲突。上海开埠之初，雒魏林在建立医院的同时，还协助麦都思建立了伦敦会上海传教站，开始小心翼翼地在这个新辟的通商口岸进行传教活动。刚开始他们还不免有些心虚，1845 年 2 月，道光帝批准耆英关于弛禁天主教的奏本后，他们的胆子逐渐大起来了。他们不仅在上海县城内外传教，而且经常秘密去附近的城镇布道了。

1848 年在上海发生的青浦教案，是近代中国最早发生的教案之一。雒魏林和其他英美传教士，在这次教案发生前就已多次进入青浦和其他县城散发宗教传单和布道。为了避免被官方以违约之名抓获，潜入内地的传教士们在出发前都要做一番准备工作，于是他们“衣服语言与中国不同，遂改穿内地服饰，学习中国口音；又恐关口盘诘，提取头发……与内地人大略相同”。<sup>1</sup>他们潜入内地后，又多联系当地教民作为向导。雒魏林等人也是事先雇好了民船，一般都在夜间上船，进内地活动一天后，夜间又乘船回上海。

1848 年 3 月 8 日，雒魏林偕同麦都思、慕维廉带了几捆传单，黎明前从上海出发，租船到青浦。他们将船停靠离青浦县城五里的地方，然后进入县城的城隍庙附近散发传单。当时有大批北上的漕粮船也停泊在青浦，来自各地的水手约有 1.3 万人。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决定削减内河漕运而多利用海路运送，大量水手将会被遣散。正巧 3 月 7 日的上渝继续遣散吴江一带的水手，雒魏林等人到达青浦时早已万民糜集，人心骚动。他们三人在城隍庙前的空场上散发布道“善书”，一些在那里闲逛的山东籍水手纷纷上前索取。雒魏林见有不少人前来，就叫麦都思、慕维廉走在前头散发。他手里拿着拐杖，自己在后面给了这些水手一些传单。据说他背对着人群，挡住了一些行人的去路。有个水手要求他让开一条路，但雒魏林不肯让路，水手被他“轻轻打了一巴掌”。这引起了其他水手的鼓噪，纷纷向他投掷石块。他就用拐杖驱赶人群，激起了众怒，于是水手们和他们在东门外展开了一场搏斗。先是落在后面的雒魏林，后是回来救他的麦都思和慕维廉，都先后被打，并被抢去了手表等物。后来来了几个人，像是来自县衙门，制止了水手对传教士们的进一步攻击。<sup>2</sup>在这次事件中，中英双方对于几个传教士受伤程度的说法明显不同。麦都思等人把自己所受到的殴辱和伤势说得很重。如麦都思被人用锄头“打晕在地”，慕维廉的腿被打得不能行走，而雒魏林更是几次被手持铁链的人打得死去活来。<sup>3</sup>而苏松太道咸龄则说他们只是“受有微伤”。<sup>4</sup>另外，在是否违反了上海开埠时订的“外人行走之地，以一日往还，不得在外过夜”的规定上，双方也有争议。咸龄按照中国传统的时间概念，认为传教士们违反了约定。而雒魏林等却将“一日”解释为 24 个小时，强词夺理地向英国领事报告说“这样做并没有违反规定。”

随后，水手们把他们带回青浦县城，交给官府处理。县衙经过调解，就派兵把他们送回上海。一到上海，他们立即向英国驻沪领事阿礼国（Rutherford Alcock）汇报，要求英国政府进行报复。阿礼国随即约见苏松太道咸龄，但他不仅不承认英国传教士违法越境和打人的罪行，反而小题大做，有意歪曲事实和扩

<sup>1</sup> 文庆等编：《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 79，中华书局，1964 年

<sup>2</sup> *Chinese Repository*, vol. 17, pp. 151-155

<sup>3</sup> 吴义雄《在宗教与世俗之间——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在华南沿海的早期活动研究》，第 281 页

<sup>4</sup> 中国历史第一档案馆编：《鸦片战争档案史料》，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 年，第 7 册，第 846 页

大事态，提出逞凶、赔偿的无理要求。咸龄一时没有满足他的要求，竟遭阿礼国以扇柄拍击头部。<sup>1</sup>之后，咸龄也采取了一些措施，包括写信向麦都思等慰问和批准将两名参与斗殴的群众逮捕等，同时也向他们指出擅自去青浦“违反了协定”。按事情经过看，这本是一次意外的纷乱和冲突，也不难秉公了结。但阿礼国仍然不满，马上着手扩大事态，使交涉升级。3月13日，他向中国方面宣布在未得到满意答复之前英国进出口船只将一概不付关税，并将阻止1400艘由海路运米到北京的粮船出入长江口。次日，他调来英国军舰“契尔顿号”封锁长江口。在上海的法国和美国领事，对阿礼国这一侵略行径是完全赞同的。当时阿礼国只有两艘很小的军舰，一艘开往南京去要挟两江总督，另外一艘封锁港口。这艘承担封锁任务的“契尔顿”号，仅是一艘装了十门小炮的双轨船，据说是靠了一个“真正的英国人”毕德门船长的坚定，就把一千四百粮船挡住不能出口。当时，道台曾下令让部分粮船在五十艘兵船护航下驶离港口，但却被这艘小小的英国军舰开了几炮就吓住了。<sup>2</sup>

清政府在不明底细的情况下，最终屈服于英国军事力量的压力。结果，咸龄被免职，由买办吴健彰署理苏松太道；在青浦逮捕了十名水手，押到上海枷号示众；赔款白银三百两，中国地方官还亲赴英舰和传教士寓所道歉。一直到5月下旬，吴健彰去英国领事馆面交定案公文，而后阿礼国照会中国政府表示同意处理结果，青浦事件才算告一段落。这本是一场水手和传教士之间未造成严重后果的斗殴事件，完全可以通过调解协商解决，而清政府屈从于英国的压力，以对百姓的严厉处置而结束。

这次事件既反映了外国侵略者的奸诈和虚伪，也暴露了当时清政府的腐败懦弱和缺乏外交知识。地方官中也有像咸龄那样具有正义感、爱国心的官员，但由于他们的无知和得不到清政府的支持，对这样的事件也无能为力。因为英国人使清政府屈服，而雒魏林等人的行为没有受到谴责，等于认可了他们的行为。此前清政府虽然多次通知外国领事约束本国人不得越界游历，但这样的结案方式使这一规定形同虚文。这次事件造成了很恶劣的后果，开辟了清廷在教案中屈服于列强的先例。它使鸦片战争后包括传教士在内的外国人不断越出条约中规定的界限，侵犯中国主权的行为显得合法化。“他们仰赖各国政府的支持与保护，尽可能地维护和扩大自己的利益；而各国政府利用传教士制造的事端，进一步扩大事态，将传教士追求的特权上升为有普遍意义的侵略利益。在西方对中国进行侵略扩张的历史背景下，来自欧美的传教士不可能把他们的活动限于单纯的宗教范围，而是或多或少的以各种形式卷入了西方在中国实施的强权政治。”<sup>3</sup>

雒魏林在这次事件中极不诚实。他分明是这次事件的肇事者，却向英国领事做出夸大、歪曲的证词，将事件的责任全部推在中国民众身上。后来，他又多次参与指认“凶犯”，要求赔偿，在事件中充当了不光彩的角色。他在《在华行医传教二十年》一书中详述了自己行医传教的成绩，却只字未提这次事件的经过。这正说明他自知理亏，不愿被后人知晓。

## 2. 劝降小刀会

1853年9月，上海发生了小刀会起义。9月7日刘丽川率上海小刀会占领上

<sup>1</sup> 中国史学会编：《第二次鸦片战争》，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第二册，第334页

<sup>2</sup> 张力、刘鉴唐：《中国教案史》，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第338页

<sup>3</sup> 吴义雄：《在宗教与世俗之间——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在华南沿海的早期活动研究》，第290页

<sup>3</sup> William Lockhart, *The Medical Missionary in China: A Narrative Twenty Years' Experience*, p. 305

海县城，杀死上海知县袁祖德、活捉苏松太道吴健彰，建立大明国，自称“统领政教招讨大元帅”，并宣布接受太平天国的领导。起义获得广大民众的拥护，队伍发展很快，并相继占领宝山、南汇、川沙、青浦等县。

雒魏林在著作中叙述了整个起义的经过，可以看出他对起义基本上是抱敌视态度的。当小刀会占领上海县城后，在他的仁济医院里就收留了不少清军的伤病员。他批评小刀会，说他们“肆无忌惮，全然不讲什么道德原则。为了贯彻自己的主张，他们什么毒辣手段都会使，决不犹豫；只要有利可图，他们对老百姓什么都干得出来。”<sup>1</sup>因为起义不利于他传教，他和在租界内的其他外国人一样恐慌，希望能迅速把小刀会消灭掉。

从小刀会起义一开始，上海的外国势力就进行了蛮横无理的干涉。刚来中国不久，后来成为“内地会”创始人的英国传教士戴德生(Hudson Taylor)进入县城，劝诱小刀会的领袖们接受调停。而他们坚定的表示：“要作战到底，甚至牺牲生命也在所不惜。”<sup>2</sup>美国传教士晏玛太(Matthew Tyson Yates)向美国公使马沙利(Marsalis)报告了小刀会起义的情况，并充当其译员前往县城察看。随后马沙利写信给刘丽川，“要他保证对美国教会予以尊重”，晏玛太又“自告奋勇，替公使致送公文”。马沙利还帮助苏松太道吴健彰逃跑，将其隐藏在美国领事馆，并支持其重建反动政权。起义发生后，英、法领事宣布实行“中立”政策，并以上海租界为中立地区，无论小刀会或清军都不得利用租界进行军事上的进攻和防御。<sup>3</sup>看起来这对小刀会和清军都是公平的，英法驻军甚至还和清军发生过几次冲突。但实际上，其中立完全是表面上的、虚伪的。1854年6月，吴健彰与英、法、美三国驻上海领事签订了关于上海海关征税规则九款，同意三国在上海海关建立关税管理委员会，并允准在上海扩大租界，以此换取他们协助镇压小刀会起义。他们在取得了许多特权后，立即抛弃了中立外衣，决定和清朝封建势力合作共同扼杀小刀会起义。英美领事开始允许清军进入租界，甚至可以在租界修筑炮台来进攻上海县城。虽然清军获得了外国的支持，但仍然无法击败起义军。于是，为了维护“贸易与和平”，法国政府第一个撕下所谓“中立”的伪装，开始直接参与消灭起义军。

小刀会占领上海期间，起义军并没有限制传教士的活动，允许他们自由传教。雒魏林从而利用当时战争的特殊环境，通过开展医务工作进行传教和扩大影响的活动。这期间，仁济医院的病人增加很多。不仅看病的人增多，住院的人也增加了不少，连大厅和花园里都挤满了病人。<sup>4</sup>他宣扬医院“大门向双方受伤人员时刻开放着”。然而来此就医的主要是清兵，因为他们常打败仗，伤员很多。他有时到城内诊所去，遇到受伤的小刀会士兵，也会给以治疗护理。在医院里，传教士们对接受治疗的伤兵宣讲“福音”，给以洗礼，力图扩大教会的影响。除了治病，他还做些救济的“善事”，有时则利用传教的机会赈济。据记载，“每逢教堂开放，城内居民成群来教堂来做礼拜”。这种做法实际上是在吸引民众，笼络人心。不过，这种小恩小惠确实对普通百姓产生了一定影响，不利于起义军团结民众坚持斗争。1855年1月中旬，他获得法军同意，经过法军阵地去看望受伤的居民，并送给他们一些钱和物品。随着双方战斗越来越激烈，直到小刀会结束对

<sup>1</sup> William Lockhart, *The Medical Missionary in China: A Narrative Twenty Years' Experience*, p. 310

<sup>2</sup> 方诗铭：《上海小刀会起义》，上海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93页

<sup>3</sup> [美]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2卷，商务印书馆，1963年，第13页

<sup>4</sup> William Lockhart, *The Medical Missionary in China: A Narrative Twenty Years' Experience*, p. 261



上海的占领，他再也无法进入县城。小刀会和清军交战造成大量居民伤亡，医院也处于不安全的位置，他经常听到炮弹在医院附近爆炸。他曾面见小刀会的将领，试图阻止他们通过医院进攻清军，并请求英国领事阿礼国同小刀会交涉。<sup>1</sup>

1854年12月间，法军司令辣厄尔(Laguerre)决定发动对小刀会的总攻之前，想利用传教士进城劝降。雒魏林得知后自告奋勇，要求法军总司令派他进城。他这样写道：“一天晚上，在法军与小刀会冲突过程中，我听说第二天早上将会有另一轮进攻。我就去见法军司令，请求通过法军阵地，进城以私人名义劝诱小刀会接受招降的命令。舰队司令告诉我可能有的危险，但我告诉我不会害怕中国人。他告诉我要在早上五点前离开，我答应在那之前会告诉他自己任务的结果。……伟烈亚力先生是在听到我的打算之后，自动参加的。……我们走到了东门，要求会见他们的头目，并要求他们派人陪我们同去，以免在路上遭到袭击。到达小刀会司令部时，他们正在开会，虽然这时已经深夜二点钟了。经过同胞，说我又一件非常紧急的事情要和司令会谈，就有两三个头日来接见我们。于是，我告诉了他们我们的来意，并说这次行动只是我个人的义务，不是官方代表。我大胆地向他们陈述了形势，来说明他们无法抵御向他们进攻的法军，又指出他们的给养无法支持很久，很快就会饿死。因此，我恳切的忠告他们接受法军司令招降的命令。他们听了我的陈述之后，就一起回到里面，商量了一段时间。最后他们出来答复我说，他们决定战斗到底。他们说，他们人很多，力量很强，虽然法军可能给他们造成许多损失，但是放弃县城会使他们全军覆没，因此他们宁死不屈。如果法军向他们进攻，也未必能将他们逐出县城。我力图说服他们，他们迟早会被征服的，到那时候，他们将无法谈任何条件，不如趁现在还可以做出安排，以保存他们的性命。‘不’，他们说，‘或者是抵抗，或者是失败，我们都将在一起。’我如此对他们进行忠告持续了两、三个小时，但是毫无结果。我只得向他们告别，回到租界向法军司令报告了此次会谈的结果。”<sup>2</sup>

小刀会如果向法军投降，并不是像他说的那样会保住性命，而是会被移交给清军处死。从他自己的叙述看，他对这一情况很清楚，却编造谎言欺骗起义军。但他明显低估了小刀会抵抗的决心，他的威胁利诱并没有吓倒起义军，劝降以失败而告终。法军司令转告英、美驻沪领事，宣布与小刀会进入战斗状态。不久，法军司令发布了向小刀会进攻的命令。他关于劝降小刀会的记叙，揭示了当时外国传教士的侵略面目，同时也可以从中看到我国人民英勇不屈的革命精神。小刀会对于法军的进攻给以坚决的反击，毙伤法军40多人。1855年2月17日，终因众寡悬殊，弹尽粮绝，小刀会被迫弃城突围。在同敌人的激战中，小刀会的将领刘丽川、陈阿林、徐耀、周秀英等相继壮烈牺牲，潘启亮率领一部分起义军参加了太平军。最终小刀会起义失败了，但它沉重打击了中外反动势力。

### 3. 对太平天国的态度

1851年，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在太平天国运动初期，基于太平天国源于基督教的考虑，除了天主教传教士之外，大多数新教传教士对太平天国表示“同情”。他们把太平天国的爆发当作西方国家解决传教与经商问题的最好契机。美国传教士丁韪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描述当时的情形说：“旧都落入任何叛乱者手中，当然是全世界瞩目关心的事。但当知道那些叛乱者竟是基督徒，他们不仅为中华帝国而战斗，而且对他们国内的偶像崇拜进行着十字架式的斗争，人们的兴奋就是无法遏止的了。商人们开始推测叛乱成功将对商业发生的影响；传教士们讨论着这个叛乱对推广福音可能有的关系；外交人员们则自认为是唯一能自由的亲自去叛乱区作考察的人，以寻求最早的机会，从一次访问南京中

<sup>1</sup> William Lockhart, *The Medical Missionary in China: A Narrative Twenty Years' Experience*, pp. 305-307

<sup>2</sup> William Lockhart, *The Medical Missionary in China: A Narrative Twenty Years' Experience*, pp. 316-318

探知事件的真相。”<sup>1</sup>

但1860年以后传教士对太平天国的批评开始多于称赞和同情，有的传教士还呼吁本国政府出兵干涉太平天国。他们对太平天国态度的变化，也反映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大多数西方国家对太平天国外交政策的变化。传教士们对太平天国的宗教有了更多地认识，他们不能容忍太平天国拜上帝教的非基督教倾向，也不能坐视太平天国占据已从条约中得到的长江流域富庶地区。因而，他们很快站到了清政府一边，支持本国政府对太平天国的干涉。

太平天国十余年间，先后有二十多名英、法、美等国的传教士到过天京。他们和太平天国往来有两个企图：一是企图通过太平天国“拜上帝教”运动，为外国基督教侵华开辟道路，加速中国全面基督教化。二是教士们需要搜集太平天国的情况，报告给本国政府。<sup>2</sup>由于平时医务工作繁忙，雒魏林没有去过太平天国统治区。太平天国运动发生后，他也表现地很关注，像绝大多数新教传教士一样主张实行“中立”。他表示“对于这些起义，我们应该保持绝对的中立，以观察未来形势的发展。我们不应该反对或者帮助他们，也还没有到把太平天国看成一个中国政府的时刻。……他们反抗清朝政府，在他们成为整个帝国统治者之前我们有时间去认识。他们的武力那么强大，影响那么广泛，我想欧洲任何力量要镇压他们，恐怕都不会成功。我们应该缓和与太平军的关系，以期推进在这个国家事业的发展。”<sup>3</sup>

虽然他对太平天国表示同情，但他对起义的胜利并不抱有希望。他分析了太平天国运动逐渐陷入低潮的原因，认为太平天国趋于衰败主要是由于不重视政权建设，“他们占领城市、杀害市民，但并不建立政府机构。他们占领一个城市后，很快撤离去攻占另一个城市。因此，整个国家受到破坏，在秩序建立上没有任何进步。……人们对叛军是敌视的，经过许多年战乱，占领区一片衰败。”<sup>4</sup>

### （三）在北京的活动

回到英国后，雒魏林完成了《在华行医传教二十年》这部自传。除了对中国习俗、机构建制描述外，还描述了外国人早期在华的医药工作。他这样总结了他在中国近二十年的医务传教生涯，“医务传道工作完全在中国展开了，这许多年的经验表明，医务传道是成功的。我们的努力没有白费，过去的成功让我们对未来充满希望。”<sup>5</sup>

1858年，清政府被迫与英、法、美、俄四国签订了《天津条约》。消息传到英国，他竭力要求英国扩大派遣传教士到中国活动，得到英国政府的赏识。1860年中英《北京条约》签订后，他被任命为英国驻华使馆的高级医生，被派往北京上任。1861年6月，他乘船离开英国，7月22日到达香港。在香港稍作停留后，8月他又来到上海。英国在北京设立使馆后，9月他以英国公使高级医师的名义进入北京。<sup>6</sup>他在北京一方面为英国使馆人员治病和负责英国公使的健康，一方面又同伦敦传教会取得联系，表示愿意帮助在北京开设一所伦敦会的医院，给中

<sup>1</sup> 丁建良著，沈弘等译：《花甲日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86页

<sup>2</sup> 张力，刘鉴唐：《中国教案史》，第30页

<sup>3</sup> William Lockhart, *The Medical Missionary in China: A Narrative Twenty Years' Experience*, p.381

<sup>4</sup> William Lockhart, *The Medical Missionary in China: A Narrative Twenty Years' Experience*, p. 381

<sup>5</sup> William Lockhart, *The Medical Missionary in China: A Narrative Twenty Years' Experience*, preface

<sup>6</sup> Alexander Wylie, *Memorials of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to the Chinese*, p.108

国人施医给药和传教。经过一番准备后，由他监管的伦敦会医院开始门诊。他成为伦敦会最早在北京开辟传教事业的传教士，同时也是第一个进入北京的基督教传教医生。

关于他在北京工作的情况资料很少。起初，他住在公使馆里接受少量前来就诊的病人。开始每天只有两三个病人，后来渐渐增多。<sup>1</sup>不久，他在公使馆旁租了一栋房子作为诊所和住所。他定期向伦敦会汇报他开展的医疗活动，写道，“当我住在公使馆时只有少量的病人前来，但我一回到住所，便需要接待任何来访的病人。此后，病人开始大量涌来。”<sup>2</sup>到1862年年底已有22,144人前来就诊，包括各个阶层的人，“带着自己的妻子、孩子纷纷到我这里来诊治，其中还有商人、店员、各种做工的人和村民，甚至许多乞丐。他们都聚集到我的诊所里，欣然地同意接受我的治疗，这是令人惊奇的。”<sup>3</sup>由于近代特殊的社会历史影响，求医者的心态也很复杂。之所以他在公使馆时很少有患者前来，是因为在一般人心目中公使馆是与中国人对立的机构，容易引起人们的仇视。而他在搬出公使馆后，来治病的人也随之增多了。在他的报告里，还提到了当时在北京霍乱的流行，这后来引起传教医生们对霍乱的探讨。

1863年，英国爱丁堡大学毕业的医学博士德贞（John Dudgeon）来到北京，协助他工作。他与德贞治病的同时，有时也进行传教活动。德贞后来将医院迁到了一所久废的寺庙里，原先破旧的佛寺经过改建修缮后，面目一新，成为具有五十张床尾的西式医院。<sup>4</sup>1863年后，伦敦会的其他传教士也开始在北京传教。他们先后在北京建立了米市大街教堂、东柳树井堂、东直门外关厢福音堂。伦敦会对这所医院相当重视，经常给予资助，使医院逐步具有了一定的标准和现代化规格。这所医院实际上这就是北京协和医院的滥觞。<sup>5</sup>

1873年，《申报》对这所医院评论说：“京都有西人设立医院一所，用以救济疾苦之人，意至善也。据云去夏至今一周年中共医有九千六百十八人，可见华人亦皆信其术精胜矣，故显宦贵官亦均有来就医者云。”<sup>6</sup>

魏林在北京活动了三年，由于身体不佳，1864年不得不决定离开北京。1864年春离开北京后，先回到了上海。次年3月，他对汉口进行了短暂访问。5月又去日本，先后游览了横滨和江户。6月初，再次回到上海。几天后，他乘船离开上海，8月14日回到英国。

他的晚年是在英国度过的，于1896年去世，终年85岁

<sup>1</sup> Harold Balme, *China and Modern Medicine, A Study in Medical Missionary Development*, p. 51

<sup>2</sup> *History of Chinese Medicine*, Shanghai, 1932, p. 239

<sup>3</sup> William Lockhart, *The Medical Missionary in China: A Narrative Twenty Years' Experience*, p. 59

<sup>4</sup> 何小莲：《晚清新教“医学传教”的空间透析》，《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3年6月第18卷

<sup>5</sup> *History of Chinese Medicine*, Shanghai, 1932, p. 243

<sup>6</sup> 《申报》1873年8月2日，转引自张海林《中外文化交流史》，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00页

### 三. 雒魏林评中医和近代中国社会

#### (一) 对中医的评价:

中医和西医是在不同历史条件下发展起来的两大医疗体系。中国晚清以前的传统医疗系统, 尽管在医学知识和医疗技术上不断有所进步, 但在体制上没有多少变化。中医传统施治方法是望、闻、问、切, 以《内经》、《素问》、《灵枢》为典籍, 治病依靠的是祖传秘方和个人累积的经验。医疗和护理均以家庭为单位, 治疗过程也以家庭为中心。医生坐堂开店, 或应病人请求上门施诊。还有许多游方郎中散布各地, 悬壶行医。当看完病之后, 医生就不必再去病人家了, 也没有继续照料病人的责任。西医的传入, 无疑对传统中国医学提出了挑战。来华传教士很早就对中医进行过研究, 这可以追溯到传教医生来华之前。17、18 世纪, 来华的一些耶稣会医生就对中医进行过研究。他们对中国古代医术表示钦佩的同时, 也指出中医在医学理论和教育上的落后。新教传教士来华后, 马礼逊和李文斯顿在澳门开办诊所, 对中医也表示出关注。他们搜集了很多中国医学书籍, 目的在于了解中国药材是否对西方的医疗手段有所补充。

传教医生来到中国, 对中国人的卫生与疾病感到触目惊心。在行医实践中, 他们依据西医的标准对中医进行了较为全面的了解和分析, 认为中医明显低于西医。他们更多地对中医持不客气地批评, 因为他们认为中医不符合近代科学原理。对于 19 世纪中国医学的情况, 在华传教医生们普遍认为古老、落后, 中医在体系上不完备。“中医因循守旧, 虽然经验比较丰富, 但它所遵循的医学准则与培训医生的方法大相径庭。……在中国, 既没有公认的医务培养体系, 又没有必要的职业许可证, 而且医生在社会上几乎毫无地位。”有些中国医生的本领虽然高明, 但他们的理论知识缺乏, 往往说不出治好病的原因。“中医可以看的书籍非常有限, 一名医生只是阅读所能找到的几本书而已。而且, 医学知识通常是作为家传秘方父子相承”。<sup>1</sup>

另外, 传教医生在医疗活动中遇到很多因为接受中医治疗而境况险恶的事例。晚清中国医学界也确实有不少医风不佳的现象, 经常发生误诊及草菅人命之事。也有一些不良风气, 不利于患者就医。如医生架子大, 稍有名气诊金就较高, 并且夜间通常不出诊, 以致常常延误治病的时机。另外, 还存在着病急乱投医的现象, 雒魏林指出“当一人病倒时, 他的家属会请来一名中医, 由医生对病人进行检查并提出治疗方案。然后经常由他治疗一两天, 如果治疗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 就会去请另一名医生取而代之。有时一个病人甚至会连续由六七名医生进行治疗。”<sup>2</sup>而传教医生中的大多数因为业务繁忙及语言上的障碍, 几乎不能与中医进行沟, 也加深了对中国医学落后的认识。

从医学理论而言, 中医采用的是有机整体的世界观。中医认为, 人身体的任何一处疾病都和身体其他部位相关联, 而诊治疾病的方法也必须从整体着眼。雒魏林对这种理论持批判态度, “根据他们的理论, 身体器官都与各种物质相联系, 比如土、金属、石头、水、空气。物质有冷、热、干燥、潮湿等特性, 疾病也有相同的特性。……治病时他们首先确定疾病的种类, 然后通过把脉选择合适的方法进行治疗。但是他们根本分辨不出静脉与动脉, 也不了解心脏的功能。他们对脉搏的解释千变万化, 大部分是不足为信的。”<sup>3</sup>中医理论基础是建立在东方古

<sup>1</sup> Edward V. Gulick, *Peter Parker and the Opening of China*, p. 41

<sup>2</sup> Edward V. Gulick, *Peter Parker and the Opening of China*, p. 41

<sup>3</sup> William Lockhart, *The Medical Missionary in China: A Narrative Twenty Years' Experience*

代哲学和当时自然科学的基础之上的。构成中医理论基础的阴阳说、五行说、经脉说，确实不是人体解剖的自然抽象，而是古人根据宇宙天象和自然推论所作的联想推论。<sup>1</sup>

雒魏林认为中医内科尚有可取之处，但外科却极度的原始，无法与西医相比。在他眼里中医只会做一些最细微末节的手术，在中国“除了阉割这匪夷所思的手术外，似乎没有什么外科手术可以展示给世人。”<sup>2</sup>他认为中医在解剖学上的知识很不完备，作为神经中枢的脑被忽视。只有解剖亲自察看人体肺脏，才能找到治病的原因，治病才有效果。西医“在眼疾治疗和解剖学方面，处于绝对的优势。因为中国人不解剖死尸，所以生理学和解剖学的知识相当有限。西医在治疗方法 and 技艺方面也远比中国博大、先进，尤其西医在外科手术方面有明显的优势：白内障可用相对简单的外科手术疗法得到治疗，身体表皮及深处的肿瘤可以得到切除，一些尿道结石也能排除。”<sup>3</sup>

中医施治方法是望、闻、问、切，并且看重把脉，将脉搏分为 12 脉，根据呼吸循环六个节拍将病情诊断为轻、重、缓、急四类。并且在治病时经常使用针灸，共有 9 种针，一般由钢、铜或银制作，形状各异。针灸的功效，让雒魏林感到吃惊。他对这种不用吃药就能治病的方法感到迷惑，不知该如何解释针灸的作用。他觉得“针灸是神秘而古老的，是大胆得足以令人昏倒的经验的产物。……这些针从不消毒，而且很可能已经存放了好几天。但可以用来治疗风湿病、各类体内深处的疼痛、扭伤、关节肿瘤和霍乱、咳嗽与疝气。”<sup>4</sup>

但他又认为，中医具有悠久的历史，也具有自身的特点。中医作为“流传了许多世纪的医学知识经验理论，已演绎出了大量中国式的经典论述、药物及疗法。……（药品）无论是种类还是数量，都给人以深刻的印象。他们使用几千种植物、粉末和混合剂，其中不少的确富有成效，一些如麻黄硷和高岭土之类的药物已为西方人所知。”<sup>5</sup>他指出中医已熟识砒霜对治疗周期性疟疾的功效，进一步研究有助于中国医学的进步。中医可以在斑疹伤寒症、热病及助产术更有成效，因为上海的民众健康状况良好，几乎没有霍乱，也没有流行病。他还表扬了中国一些主要城市的中医诊所。<sup>6</sup>虽然社会上许多庸医，但他认为中医在行医时有独到之处，“虽然从医人员的成分也很复杂，但许多是科考失意的士子转行，因此很多医生受过好的教育。……他们也有分科，有的治疗感冒之类的普通疾病，有的治疗妇科病，有的治疗儿童的病等。医生根据他们丰富的经验，很好地治愈了一些病人。虽然他们的理论很不完善，但他们早已了解了药物的用途和种类。他们能根据以往的病例进行仔细的观察，从而成功地找到治疗方法，他们的医治方法主要依靠经验。虽然他们进行治疗的原则并不清晰，但他们完全按自己的方式诊治病人，也因此赢得了人们的尊重，并能去很远的地方出诊。”<sup>7</sup>

---

, pp. 114-115

<sup>1</sup> 黄建平等著：《中中西医比较研究》，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年，第15页

<sup>2</sup> William Lockhart, *The Medical Missionary in China: A Narrative Twenty Years' Experience*, p. 113

<sup>3</sup> Edward V. Gulick, *Peter Parker and the Opening of China*, pp. 43-44

<sup>4</sup> William Lockhart, *The Medical Missionary in China: A Narrative Twenty Years' Experience*, p. 114

<sup>5</sup> Edward V. Gulick, *Peter Parker and the Opening of China*, pp. 42-43

<sup>6</sup> William Lockhart, *The Medical Missionary in China: A Narrative Twenty Years' Experience*, pp. 23-24

<sup>7</sup> William Lockhart, *The Medical Missionary in China: A Narrative Twenty Years' Experience*, pp. 113-114

## （二）对近代中国社会的认识：

在华活动的二十年中，雒魏林在从事医务传教活动的同时，也对当时的中国社会进行了深入观察。

雒魏林对中国的教育评价很高，“中国是个有教养的民族，他们很看重学习知识。……在中国的城市，晚上可以看到许多工人、小业主，甚至门房都坐在门口看书。虽然他们并不是很理解书的内容，但在试图弄懂意思。他们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接受教育，只要条件允许，就会送他们去学校。”<sup>1</sup>他还介绍了中国的科举制度，看到中国人对于学业和科举考试的重视，也承认这种选拔制度有一定的合理性。他认为中国有自己的文明，但中国传统教育的成果并未完全达到培养人才的目标。他认为中国学者虽然读书很多，但知识面很狭窄，应该在不改变中国教育传统的同时，还要从西方引进新的教育成果来改变一些错误的思想。<sup>2</sup>相比而言，中国武官选拔制度就相当原始、落后。“武官大多是文盲，武官考核选择的标准是主要是力量、技巧和敏捷性，比如投掷一百磅重的石头、把箭射入靶心、连翻两个跟斗等。”<sup>3</sup>

他在行医过程中逐步了解了一些中国的风俗习惯。他注意到喝茶在人们交往中的重要作用，“中国人在消遣和进行社交活动时，茶是唯一的饮料，喝茶可以说是整个国家的习俗。……朋友们经常聚在茶馆里，一边喝茶，一边高兴地谈话。同时，茶馆还是传播信息的渠道，但它处在官方的监视下，以防有煽动性的言论。”<sup>4</sup>他有时也会跑到茶馆，一面喝茶，一面听人们讲话，从而了解了不少上海人的情况。另外，他还介绍了中国主要种植的农作物和各种食品的生产。

同时，雒魏林也对中国社会存在的一些丑恶现象也进行抨击。传教士一来到中国，感觉最触目惊心的就是中国人的卫生与疾病。他们认识到眼病传染、天花、鼠疫、等流行，都与环境不洁、卫生习惯不良有密切关系。当时中国社会存在着吸食鸦片、赌博、缠足、卖淫及道德堕落等陋习，他们往往利用中国存在的这些恶俗来宣扬自己的观点，其中谈论最多的是吸食鸦片和缠足。传教医生通过和病人的接触，感觉到社会陋习对人们的伤害。他们不仅视治病为己任，还把革除这些陋习看作他们工作的一部分。首先这些都与基督教教义相悖，对于身为专业医生的他们来讲，还因为关注到与此相关的疾病与死亡。

当时中国社会最突出的是鸦片烟的问题。19世纪以来，鸦片吸食者遍布中国，其流毒之深，为中国有识之士所痛恶。对中国人，特别是沿海地区的官员和居民普遍吸食鸦片的谈论可以在每个传教士的通信和论著中看到。早期来华传教医生大都致力于医治鸦片流毒的工作，他们在禁止鸦片贸易、医治烟毒祸患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探索出各种颇具特色的治疗方法，精神疗法是他们普遍采用的戒烟手段。1845年玛高温在宁波开始用一种土法给烟民进行治疗。治疗的方法是烟民先禁烟24小时，不服用任何药物，然后再进行适当地对症治疗，一个月为一个疗程。<sup>5</sup>从19世纪70年代起，中国的医院内也普遍设立鸦片治疗所。

<sup>1</sup> William Lockhart, *The Medical Missionary in China: A Narrative Twenty Years' Experience*, pp. 5-6

<sup>2</sup> William Lockhart, *The Medical Missionary in China: A Narrative Twenty Years' Experience*, p. 22

<sup>3</sup> William Lockhart, *The Medical Missionary in China: A Narrative Twenty Years' Experience*, p. 59

<sup>4</sup> William Lockhart, *The Medical Missionary in China: A Narrative Twenty Years' Experience*, pp. 42-43

<sup>5</sup> 田涛：《清末民初在华基督教医疗卫生事业及其专业化》，《近代史研究》，1995年第5期

对于吸食鸦片，他提到“几千名吸食鸦片的人在医院得到了治疗。许多人无法戒烟，他们认为不能被治好，如果不吸鸦片他们会死。但当他们看到其他人在医院里成功地戒掉了烟瘾，他们也要求治疗，这也极大提高了医院的名气。在1849年，许多病人看到自己的朋友被治好，对于戒烟也充满了希望。有些人并没有彻底戒除烟瘾，后来又复发了。但更多的人坚持下来，最终彻底摆脱了鸦片的奴役。”<sup>1</sup>他分析了中国人吸鸦片的原因，认为“中国人吸鸦片最通常的原因是他们不知道怎样消磨业余时间。当做完一天的事情之后，没有什么特别的活动能吸引他们，家里人也不能使他们呆在家里。他们晚上无事可做，四处闲逛，很容易走进烟馆。在那里，他们会经常遇到熟人请他们吸鸦片。”他认为鸦片会妨碍传教，“无法相信一个烟鬼会有什么信仰，除非他丢掉这个恶习。传教士有必要确认他们没有这个恶习，才能允许他们入教。……一个吸鸦片上瘾的人很快在其他方面也会变坏，做出许多可耻的事，逐渐走进深渊。”<sup>2</sup>

他曾目睹几个鸦片贩子被处死，认为官方这样做是为了警告外国人：正是他们向中国输入鸦片，才导致了这些人的死。<sup>3</sup>他也谴责了东印度公司向中国输入鸦片的罪行。主张中国政府应废除鸦片贸易，除了药用以外，限制在国内种植鸦片，同时禁止从外国输入鸦片。当然，他之所以反对鸦片贸易是从人道的角度出发，同时也是因为鸦片贸易危害了传教事业。而对鸦片战争他则是极力鼓吹，想借这场战争打开中国的门户。他站在自己国家立场上对这场战争进行评论，认为战争的起因完全是由于钦差大臣林则徐禁烟不当。<sup>4</sup>

他看到了中国人吸食鸦片的危害，认识的人相互影响造成吸食鸦片人群的广泛，严重破坏了吸食者的健康，导致人们破产，甚至卖儿卖女。他于1847年撰文《鸦片速改七戒文》，着力于宣传戒烟。他提出的方法是，“要戒除烟瘾，首先要交出烟枪烟具，不能再吸。专门提供一个地方，将鸦片与樟脑和收敛剂混合制成药丸，收敛剂包括石榴皮和粉末。另外，药丸里面还要适当添加一些滋补品，如苦木树、酞剂或香油的混合物。……需要注意的是，在戒烟期间要保持基本的饮食。他们在食用药丸几天后，身体各处的疼痛会逐渐消退，再逐渐减少药丸里的鸦片，直到最后完全清除。”<sup>5</sup>

女子缠足也是中国一大弊病，为来华西人所诟病。传教医生最早在医院里，真切地目睹和感受了裹足妇女的痛苦。如脚趾骨扭曲、变形甚至断裂、皮肤溃烂、血脉不畅、小产、难产的高发。为革除裹足陋俗，他们做出了一些努力。雒魏林在自传中用了近10页的篇幅，评论了缠足问题。他看出缠足的盛行在地域上有区别，“来到舟山医院的所有女人以及在岛上见到的其他女人，所有人的脚都不是自然生长的。缠足在舟山是普遍的，而在广东和澳门并不盛行。”<sup>6</sup>他认为缠

---

<sup>1</sup> William Lockhart, *The Medical Missionary in China: A Narrative Twenty Years' Experience*, p. 384

<sup>2</sup> William Lockhart, *The Medical Missionary in China: A Narrative Twenty Years' Experience*, p. 397

<sup>3</sup> William Lockhart, *The Medical Missionary in China: A Narrative Twenty Years' Experience*, p. 36

<sup>4</sup> William Lockhart, *The Medical Missionary in China: A Narrative Twenty Years' Experience*, p. 403

<sup>5</sup> William Lockhart, *The Medical Missionary in China: A Narrative Twenty Years' Experience*, pp. 383-384

<sup>6</sup> William Lockhart, *The Medical Missionary in China: A Narrative Twenty Years' Experience*, p. 337

足是种野蛮的习俗，主张应该废除这种陋俗。他还从生理和健康的角度来抨击缠足，认为缠足破坏了女人身体的平衡，使她们走不快也走不远，容易跌倒摔伤自己。他在治疗病人时，就经常遇到一些因缠足产生的疾病。一个老年妇女从楼梯上摔下来导致骨折，经过他的治疗才保住了两条腿。一个女人在干活时不小心摔倒了，摔断了胫骨。医生需要对她进行接骨，但她的家人不同意，结果她很快就死去了。<sup>1</sup>

由于灾荒、战乱等原因，近代中国到处晃动着流浪乞讨者的身影，其中有许多“职业化”的乞丐。魏林走在大街上，有时会给他们一些钱和物品，但后来发现自己受骗了。他觉得乞丐已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每当遇到发生的旱灾时，随处可见一群群的乞丐。官府向他们发放救济，传教士们也尽力向他们提供食物。除了一些暂时遇到难关的人之外，许多乞丐都是职业的叫化子。……他们白天装作瞎子、瘸子和哑巴来沿街乞讨，到晚上就聚在一起挥霍乞讨来的金钱。他们对路人纠缠不休，采用堵住店门、敲钟、吹喇叭或是展示不堪入目的脓疮等手段，强迫别人满足他们的要求。”<sup>2</sup>

在近代，中国城乡的公共卫生情况十分恶劣。人们通常将污水直接排放到纵横交错的小河里，富家宅院皆有厕坑。但居住在贫困区多层楼房中的穷人，却不得不使用马桶。城镇粪便、垃圾则由专门行业负责，卖给郊区的农民当肥料，但是随处乱放尿桶、随地大小便、乱扔垃圾的现象仍很严重。<sup>3</sup>他批评了上海卫生状况的糟糕，“这个城市拥有众多的河流，用船进行交通和运输。但它总是处于不清洁的状态，运河水位低时，许多的污秽物不断丢进水里，而人们很少进行清理。令人惊奇的是当地人很习惯于这样的生活。有些欧洲人由于健康状况不佳，不得不离开了上海。”<sup>4</sup>

---

<sup>1</sup> William Lockhart, *The Medical Missionary in China: A Narrative Twenty Years' Experience*, p.367

<sup>2</sup> William Lockhart, *The Medical Missionary in China: A Narrative Twenty Years' Experience*, pp. 251-253

<sup>3</sup> 王卫平：《明清时期江南城市史研究：以苏州为中心》，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71页

<sup>4</sup> William Lockhart, *The Medical Missionary in China: A Narrative Twenty Years' Experience*, p.244



## 四. 结论

早期来华传教医生从事医务活动，主要是通过创办医院、向病人施医舍药来实现。但他们创办的这些医院，用今天的眼光来看，并不能算是真正的医院。近代意义上的医院，除了是一个包括候诊室、门诊室、住院部、隔离病房、手术室、药房等在内的医疗场所外，还应当是“医学教育和研究的中心；它们成了医学知识的庇护所、医学职业机构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机构、医学权力的堡垒”。<sup>1</sup>而这些早期的教会医院“墙壁通常是多孔或是由晒干的土坯砌成的，地板是打平了的泥土、混凝土或者砖块。窗户是纸糊的，很少敞开。……房屋里的家具极少，除了中国式木制或竹制的床、一两张桌子及一些椅子以外，没有其他东西。”<sup>2</sup>医院的设施也很简陋。“住院病人的一切用品包括衣服被褥等都要从家里带来，病人则要由他们的亲友来照看，人们不断地进进出出，嘈杂而烦扰。医院没有护士，无法监督病人起居饮食，不可能保证哪怕是最低程度的卫生，也谈不上无菌操作。在一些寒冷的地方还要窗户紧关，最起码的通风都谈不上。连绵不断的战争又使这些诊所和医院时开时闭。”<sup>3</sup>

虽然这些早期的教会医院比较简陋，但与中国传统的医疗场所相比，还是显示出规模化和专业化的优势。教会医院除了传统的内外科的分工之外，还出现了更多的如产科、神经科等专业分工，实行专业就诊，为许多患同一种特殊疾病的病人看病能够提高专业化水平。它们初设之际一般都实行慈善医疗，即免费施诊送药，有的还给一些贫病者免费供食住。当然，对于传教医生而言，医务传教活动的最终目的是要引导人们皈依上帝。但对于近代中国人而言，他们的认识与传教医生们的期望并不完全吻合。在医务传教活动开展之前，信奉新教的中国人是极少的。直到马礼逊入华7年后的1814年，才有第一个中国教徒蔡高受洗入教。1816年梁发在马六甲受洗，成为第二个华人信徒。1834年马礼逊在广州去世时，伦敦会的中国信徒总共只有13人，而且这些人大都与梁发有关系。<sup>4</sup>即使是医务传教活动广泛开展之后，也没有达到他们预期的效果。尽管传教医生们抱有传播基督教的热情，但很快就被卷入繁重的医疗事务中，而没有精力从事传教。根据中国医务传道会的有关报告，在1861-1872年间，教会医院收治的409,000位病人中仅有12人归依基督教。<sup>5</sup>

在医务传教活动中，传教医生们普遍感到传教与行医之间存在着矛盾。他们逐渐觉得，虽然自己是“激动人心的宣教者”，但中国人对医生的需求明显超过对传教士的需求。在仁济医院里，雒魏林起初亲自对病人布道，并发放宗教小册子。但随着医务活动的繁忙，医院的传教工作逐渐交给专门的传教士负责。他认识到传教士和医生的职责不可混淆；传教医生首先是医生，其次才负有传教之责。他指出：“如果医务传教工作是任命的，不管是好的外科医生，或是好的牧师，恐怕都要糟蹋了。我在新教和旧教中，都看见过这种情况，一个试图从事两份职业，常常要在一方面失败，有时则在两方面都要失败，因而不但不能得到好的影响和行善事的能力，反而会失去已得到的影响和行善事的能力。……传教医生应该是世俗人士——是医生，而不是任命的牧师。我相信，如果一个牧师经过几个

<sup>1</sup> [英]威廉·F·拜纳姆著，曹珍芬译：《19世纪医学科学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33页

<sup>2</sup> Harold Balme, *China and Modern Medicine, A Study in Medical Missionary Development*, p. 86

<sup>3</sup> Harold Balme, *China and Modern Medicine, A Study in Medical Missionary Development*, p. 88

<sup>4</sup> 吴义雄：《在宗教与世俗之间——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在华南海岸的早期活动研究》，第45页，第62页

<sup>5</sup> *Chinese Recorder*, vol.5, p.150

月的听课和医院实习后，就可以变成一位合格的医生，那是错误的。”<sup>1</sup>基于这样的看法，雒魏林主张行医与传教应分离。

虽然传教医生在医务传教活动中没有达到传播“福音”的目的，但他们的医务活动还是对中国社会与民众发挥了积极作用。正如医药学家陈邦贤评价的一样：“……逐渐证明：外国医院组织充实，尤优于中国，外国医术减轻人民痛苦，救免夭亡，同时中国人反对基督教之偏见亦见消除，当初医科传道会设立之目的，亦可谓远矣！各医院之功绩不独为人治愈疾病，减少死亡率，而训练甚多中国助手，翻译西国医学书籍为汉文，传播西国医学知识于中国，其功亦不少也。”<sup>2</sup>传教医生是近代西医学在中国传播的重要力量，他们把西方医术传入中国，使中国的传统医学受到冲击，开始走上一条中西医相结合的道路。他们不仅创立了一批教会医院、诊所，而且传播了近代医学知识；不仅影响了中国人对西方的看法，而且对传教以至中国政治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首先，医务传教活动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基督教传教活动的进行。传教医生的医疗活动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人对外国人和传教士的看法。不少人感受到西方医学的灵验，往往从很远的地方到教会办的医院去就治。有人因此而成为信徒，但这种情况起初并不突出。其次，传教医生传入的西方的医疗方法和管理方法，很多也是值得借鉴的。比如在治病的同时，也要注意抗病、防病；对特殊病例的跟踪和分析；对病例进行分类研究，建立病例档案制度等等。为了在观察和检查病人身体方面有条不紊，教会医院开始使用专门的记录簿，通过表格详细描述病人的基本情况。“中国医务传道会”的每个医院都对重要的病例进行记录并报告，为医学研究提供可靠的文献。再次，传教医生还对中西文化交流做出了贡献。传教医生在治病之外还向中国人教授近代医学，培养了中国第一批西医人才。这些人学习西医后，或为教会服务，或自己行医，为中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他们的成功“将使他们受到尊敬，当然，也将增强传播这些知识的人的威信。病人不仅能听到，而且能感受到从西方来的人是好人。”<sup>3</sup>传教医生们还有许多医学著作，这以合信、嘉约翰等为代表。以合信为例，他先后著有《博物新编》、《全体新论》、《西医略论》、《妇婴新说》、《内科新说》五种医书，王韬称赞其作“笔墨简洁，讲论精核，真传作也”。<sup>4</sup>

雒魏林作为传教医生，在中国活动了二十年，对中国社会有比较深入的了解。虽然他抱有很高的宗教热情，但正如他自己所叙述的一样，在实际行动上却常常顾此失彼，不得不把主要精力放在医疗事业上。在他到东方来的二十年间，据他估算，曾在爪哇、澳门、香港、舟山和上海等地，共诊治了二十万人次。<sup>5</sup>他长期进行的医务传教活动也必定会对中国人的心理产生一定影响，至少使部分中国人改变了对外国人的冷漠心理和看法，这种潜移默化的作用是不容低估的。正如仁济医院年报所期望的“医院只要能有序地继续下去，其社会影响面就能逐渐扩大。不但能证明它是减轻身体病痛的场所，而且通过向当地民众展示基督教文明带来的巨大益处，能为他们创造机会聆听有关上帝的信念。我们通过这些展示兄弟般仁爱的活动来加深中国民众对基督教的印象，并努力向他们证明，我们在致

<sup>1</sup> William Lockhart, *The Medical Missionary in China: A Narrative Twenty Years' Experience*, pp. 112-117

<sup>2</sup> 陈邦贤：《中国医学史》，上海书店，1984年，第190页

<sup>3</sup> *Chinese Repository*, vol. 2, p. 32

<sup>4</sup> 方行、汤志钧整理：《王韬日记》，中华书局，1987年，第55页

<sup>5</sup> William Lockhart, *The Medical Missionary in China: A Narrative Twenty Years' Experience*, p. 281

力于他们的世俗与精神的福祉。“<sup>1</sup>他有高超的医术，就像王韬称赞他“称刀圭精手……尤精于眼科，藏有空青数枚，光滑如鹅卵，摇之中有水声。他如痈疽恶疮、跌打损伤，治之多立愈”。<sup>2</sup>作为一名医生，可以说他是成功的。

他医治了成千上万的病人，但针对医务传教活动的最终目的来说，他不能算是成功的。作为传教士，他所能获得的宗教上的成果只是病人对他的感激以及回家后阅读《圣经》的承诺，而真正受洗入教者却不多。因为中国人在对教会医院进行肯定的同时，并不是肯定基督的福音。作为一名传教医生，虽然他声称自己对政治毫无兴趣，但在华期间还是参加了一些政治活动。更是由于他在青浦教案、小刀会起义中的不光彩表现，在一些著作中被称为“帝国主义帮凶和走狗”。他也像其他传教士一样，往往站在本国立场上错误地评论中国人民的反抗斗争。在《在华行医传教二十年》一书中他极力歌颂上帝是拯救人类肉体 and 灵魂的万能之主，对自己的一些活动有所美化。在华医务传教活动虽然取得了不少成果，但传教形势并不像他说得那样乐观。他相信如果能在中国成功传播基督的福音，西方文明就能够照耀中国。不过，他觉得近代中国虽然远远落后于西方，但也有自己独特而悠久的文明。他作为传教医生来到中国，在中国活动了二十多年。他在医务传教活动中更多履行了医生的职责，客观上为西医的传入和近代中国医学的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回顾基督教医务传教的历史，行医与传教活动在中国的遭遇截然不同。传教医生在中国开展医务传教活动，起初是想借助医务活动促进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但中国社会需要的是他们的医术，而不是所谓的上帝的真理，结果是就医者多而入教者少。即使一些中国人在传教医生“感化”下信了教，很大一部分也是为了吃教，而不是真正地信仰基督。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不平等条约规定了“传教自由”，传教士不仅活跃在通商口岸，而且深入到内地传教。与此同时，更多的专职医生也陆续来到中国，参与了西医传播的行列。这样，医学和传教相结合的关系逐渐松弛，医务传教中的宗教色彩也逐渐淡化。如果说起初传教医生还幻想医学所能焕发的神奇力量来宣扬基督教福音，那么从六七十年代开始他们开始热衷于以自己的医术换取中国人对西医乃至西方文明的认可。那些兼行传教的传教医生终因负担过重，越来越脱离布道工作，成为专职医生。中国人对西医的态度，从怀疑到接受和认同，以及对传教医生的医学活动的赞誉，正是这一状况的反映。清末的西医院门口随时可见门庭若市的场景：“看一看在医院大门外，排在大街上的候诊的队伍，看一看每天清晨从四面八方涌来的车马轿子，看一看那些官员、侍从、马夫、轿汉，是如何把整条街挤得水泄不通的”。<sup>3</sup> 1886年“中华博医会”的成立，标志着基督教在华医务传教工作的终结。此后，来华的传教医生已不再担任传教工作，而致力于西医学在华的介绍和传播。即使是由教会创办的西式医院，已成为从事医疗诊治和研究的机构。在探讨医务传教是否成功的问题时，如果用中国人对医药的需求来衡量传教医生所取得的成绩来看，医务传教无疑是成功的。

<sup>1</sup> *Report of the Chinese Hospital, at Shanghai, from July 1st 1847 to December 31st 1849*, by the Committee, Shanghai, 1849, p. 15

<sup>2</sup> 王韬：《瀛阮杂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119页

<sup>3</sup> [美] 乔纳森·斯潘塞著，曹德骏等译：《改变中国》，三联书店，1990年，第43页。

## 参考文献

### 一. 中文论著:

1. 李志刚:《基督教早期在华传教史》,台湾商务印书馆,1985年
2. 王铁崖主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三联书店,1982年
3. 顾长声:《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来华新教传教士评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
4. 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
5. 顾卫民:《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
6. 林治平:《基督教与中国论集》,宇宙光出版社,1993年
7. [英]威廉·F·拜纳姆著,曹珍芬译:《19世纪医学科学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
8. [美]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
9. 林治平主编:《近代中国与基督教论文集》,宇宙光出版社,1985年
10.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近代来华外国人名辞典》,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
11. 赵洪钧:《近代中西医论争史》,安徽科技出版社,1989年
12. 陈邦贤:《中国医学史》,上海书店,1984年
13. 黄建平等著:《中西医比较研究》,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年
14. 汤清:《中国基督教百年史》,(香港)道声出版社,1987年
15. 张力、刘鉴唐:《中国教案史》,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
16. [美]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2卷,商务印书馆,1963年
17. 马伯英等编:《中外医学文化交流史——中外医学跨文化传统》,文汇出版社,1993年
18. 李经纬主编:《中外医学文化交流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
19. 葛壮:《宗教与上海社会变迁》,上海书店,1994年
20. 杨天宏:《基督教与近代中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21. 吴义雄:《在宗教与世俗之间——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在华南沿海的早期活动研究》,广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3月
22. 文庆等编:《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中华书局,1964年
23.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7册,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
24. 朱金甫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清末教案》第1册,中华书局,1998年
25. 丁黉良著,沈弘等译:《花甲日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
26. 方诗铭:《上海小刀会起义》,上海人民出版社,1965年
27. [英]汤森著,王振华译:《马礼逊——在华传教士的先驱》,大象出版社,2002年
28. [美]乔纳森·斯潘塞著,曹德骏等译:《改变中国》,三联书店,1990年
29. 赵春晨、雷雨田等:《基督教与近代岭南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
30. 中国史学会编:《第二次鸦片战争》第2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
31. 张海林:《中外文化交流史》,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
32. 王卫平:《明清时期江南城市史研究:以苏州为中心》,人民出版社,1999年

33. 何小莲：《西医东渐与文化调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
34. 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
35. 方行、汤志钧整理：《王韬日记》，中华书局，1987年
36. 王韬：《瀛氛杂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
37. 何小莲：《晚清新教“医学传教”的空间透析》，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3年6月，第18卷第2辑
38. 李传斌：《20世纪基督教在华医疗事业研究综述》，南都论坛（人文社会科学学报），2006年7月，第26卷第4期
39. 何小莲：《西医东传：晚清医疗制度变革的人文意义》，《史林》，2002年第4期
40. 赵璞珊：《西洋医学在中国的传播》，《历史研究》，1980年第3期。
41. 徐如雷：《基督教在华传教事业的历史评价》，《宗教》，1996年第3期。
42. 田涛：《清末民初在华基督教医疗卫生事业及其专业化》，《近代史研究》，1995年第5期
43. 刘荣伦：《清民时期外国医生对广州医药卫生的影响》，《广东史志》，1996年第3期。
44. 梁碧莹：《慕约翰与西医学在中国的传播》，中山大学学报，1996年第3期。
45. 梁碧莹：《“医学传教”与近代广州西医学的兴起》，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5期。
46. 陈建明：《近代基督教在华医疗事业》，《宗教学研究》2000年第2期。
47. 王立新：《晚清政府对基督教和传教士的政策》，《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3期。
48. 吴义雄：《医务传道方法与“中国医务传道会”的早期活动》，中山大学学报论丛（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3期，第20卷。

## 二. 外文资料:

1. William Lockhart, *The Medical Missionary in China: A Narrative Twenty Years' Experience*, London:1861
2. *Chinese Repository*, vol.1-20, 1832-1851
3. *Chinese Recorder*, Shanghai, 1912-1988
4. George B. Stevens, *the Life, Letters, and Journals of Rev. and Hon. Peter Parter*, Boston, 1896
5. D. Mac Gillivray, *A Century of Protestant Missions in China*, Shanghai: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907
6. Alexander Wylie, *Memorials of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to the Chinese*, Taipei,1967
7. William Warder Cadbury and Mary Hoxie Jones, *At the Point of A Lancet: One Hundred Years of the Canton Hospital 1835 - 1935*, Shanghai: 1935
8. E. S. Elliston, *Ninety - five Years: A Shanghai Hospital, 1844- 1938*
9. Harold Balme, *China and Modern Medicine, A Study in Medical Missionary Development*, London, 1921
10. G. H. Choa, *Protestant Medical Missionaries in China*, the China University Press, 1990
11. Edward V. Gulick, *Peter Parker and the Opening of Chin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3